

三

日伪控制下的
新闻、广播与出版

抗日战争图书馆藏书
www.krzzz.com

抗日战争图书馆藏书
www.krzzjn.com

东北沦陷时期的广播电台

吉林省广播电视厅史志办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伪满洲国在吉林省境内先后设有4座广播电台，即新京放送局、吉林放送局、延吉“间岛”放送局、通化放送局。这些广播电台是由伪满洲国电话株式会社（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鼓吹“日满协和”，以奴化中国人民，实行殖民统治。

新京放送局

1932年10月，侵略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由奉天（现沈阳）迁到新京（现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特殊通讯部借用新京电话局两个房间，改造成演奏室（即演播室和播音室）和调整室（兼做接待室）。同年10月31日，以奉天放送局新京演奏所名义，通过长途电话线路将广播讯号传到奉天放送局播出。它是新京放送局的前身。

1933年4月3日，经过一段时间筹备的新京放送局开始播音。呼号为MTAY，发射功率1千瓦，频率570千赫，波长529米。广播发射台是由原设在东三马路的收发报用的无线电台改造成的。新京放送局初期，每天晚17点钟开始播音（星期六或节假日从上午9点开始播音），除转播日本东京中央放送局的部分日语节目外，自办节目有《新闻》（包括汉语、日语、朝鲜语、英语、俄语）、《儿童时间》、《文艺》、《日语讲座》、《汉语讲座》等。同年8月，根据日本和伪满洲国政府签订的《关于在满

洲设立日满合办通讯公司协定》，在大连设立了合资经营的伪满洲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统一经营管理东北的通讯广播事业。这时，新京放送局并入该株式会社，由大连管理处领导。同时，把呼号改为MTCY。

为了扩大对东北境内的欺骗宣传，对抗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的广播宣传，1934年由伪满洲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筹资，在新京宽城子新建一座发射台，安装了日本电气会社制造的100千瓦长波广播发射机，同时在该株式会社本部大楼内新建了增音、播音室，安装了较好的设备。同年11月1日开始播出，频率180千赫，波长1666米。当时能覆盖东北大部地区，是亚洲大功率的发射台之一。

1935年11月，伪满洲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本部大楼在新京大同大街601号（现长春市西安大路2号）建成。该株式会社本部即由大连迁来新京。同年11月10日，新京放送局也由长春市南广场迁入本部大楼内办公。这时，新京放送局的内部机构有业务课、技术课。1936年，增设了营业所。

1936年11月，新京放送局的广播发射台新增了一部由日本东京电气会社制造的10千瓦中波发射机，频率560千赫，波长536米。从此，新京放送局开始办两套节目（分第一广播和第二广播），用两个频率播出。100千瓦长波发射机作为第二广播，主要是播出汉语节目；同时也播出一部分英语、俄语、蒙古语节目。10千瓦发射机作为第一广播，主要播出日语节目，有时也播出朝鲜语节目。这时的节目设置，除保留部分原有节目外，新增加了《先哲故事》、《圣经讲义》、《对学校广播》、《对家庭广播》、《协和青年讲座》、《生活改善讲座》等。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伪满洲国广播宣传的控制。同年7月又增设了《时事解说》等节目，并随时播

播殖民主义的政治口号。东北地区的广播宣传以新京放送局为中心，广播节目由它组织编排，统一播出，各地方放送局实行联播。并把广播节目分为甲、乙、丙三种节目。规定：甲种节目占全部节目的85%，地方放送局必须一律转播；乙种节目占10%，这类节目未经许可，地方放送局也不得随意变更，要一律转播；丙种节目占5%，在此规定时间内，各地方放送局可以自由转播，或播出地方性节目。凡属涉及国际性、伪满洲国的重要新闻报道、言论和政策性的讲话等，都要由新京放送局组织、编排和播出。1938年5月，新京放送局升格为新京中央放送局后，隶属伪满洲国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新京管理局领导，内设机构除保留庶务课、技术课，新增设了主管广播宣传的放送课。

为了加强国际广播，接管大连中央放送局的对外宣传任务，新京中央放送局于1939年6月和1940年7月在宽城子广播发射台增设了两部20千瓦短波广播发射机，使用汉、日、蒙、俄、英（有时使用德、法语）等语言，分别对远东、欧洲、北美西部、中国南部、南洋、海峡殖民地（马六甲海峡附近）、澳大利亚等地广播，每天广播4次，全天播音3小时55分钟。1940年1月，新京中央放送局为进一步加强对内对外宣传报道工作，调整了内设机构，除保留原有的庶务课、技术课外，将放送课扩充为三个课，即报道课、国际课、学艺课。同时，增加了工作人员。1941年1月8日，在对欧洲广播中开始定期的德语广播。最初每周三、六两次。同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新京中央放送局进一步扩充了反苏反共的宣传，延长了俄语广播时间。同年8月，又调整对外广播，对上述地区都增加了广播时间，其中德语广播时间延长到每次30分钟。

日本对美、英等国宣战后，为使广播宣传适应“大东亚圣战决战体制”的要求，实行了“日满一体化”的严格控制，新

京中央放送局对战况的报道、舆论的统一、对外宣传等方面都做出新的规定：各地方放送局只许转播新京中央放送局统一编排和播出的节目，不得播出自办的广播节目；将每天第二广播（主要是汉语）中的《新闻》节目增加到10次，并随时中断正常广播，插播日本东京中央放送局的临时新闻；第一广播（日语广播）全部转播日本东京中央放送局的节目。为了从领导体制上加强对广播宣传的直接控制，伪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把本部放送课与新京中央放送局合并，于1943年4月组成了本部直属的放送总局。放送总局拥有指导、监督和组织各地方放送局广播工作实施的一切权力。其内设机构有监理课、庶务课、编成课、报道课、国际课、学艺课和技术课。

为了推行和宣传“对付南方决战”（指太平洋战争和侵华战争），“加强北边镇护”（指反苏反共），“强化国内体制”（指加紧对东北人民的思想统治和经济剥削）和“发扬战时生活意识”等侵略和统治政策，1943年春，新京中央放送局举办了大型“农村新年”特辑节目，加强对农村的广播。同年2月17日至19日，连续三天播出了日本关东军报道队录音班采制的日军守卫北方的报道。同年5月用一周时间，反复宣传“防空生活化”的要求。为了灌输对“职域（工作岗位）即战场”的意识，从6月1日起在广播中增设了《产业体操》节目。在第二广播中举办了两次所谓“慰问产业战士”文艺广播晚会。这一类奴化宣传，一直延续到1945年8月15日东北光复。

吉林放送局

吉林放送局前身是新京放送局吉林演奏所。1934年11月，吉林演奏所将借用的吉林市电报电话局的房间改建成演播室和调整室，通过长途电话线路，向新京放送局传送广播节目。

1944年4月，吉林放送局开始筹建，12月试验播音。1945年2月，正式播音。呼号MTWY，使用两部50千瓦中波发射机，频率分别为725、1160千赫。地址在吉林市南大马路（现重庆路62号附近）。吉林放送局设有汉语和日语两套节目，主要是转播新京放送总局编排的节目。

吉林放送局隶属伪满洲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新京管理局领导。

延吉“间岛”放送局

延吉放送局于1938年4月1日开始试验广播，呼号MTKY，发射功率10千瓦。地址在伪间岛省延吉县延吉乙字街（现延吉市光明街）。同年11月1日，改用大连义昌无线电公司制造的200千瓦中波发射机正式播音，频率785千赫，波长382米。

延吉放送局初期采用汉语、日语、朝鲜语混合广播，以日语广播为主。除转播新京中央放送局的《新闻》节目外，还转播新京中央放送局和奉天中央放送局的讲演、文艺等节目。

1942年11月1日，延吉放送局增设一部50千瓦中波广播发射机，频率1270千赫，开始办两套节目，使用两个频率。新设的50千瓦广播发射机为第一广播，以日语为主；原有的200千瓦广播发电机为第二广播，以朝鲜语为主，有时也播出部分俄语节目。

延吉放送局开始隶属伪满洲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新京管理局领导。1942年5月1日，延吉放送局改称“间岛”放送局。从1943年起，“间岛”放送局又改由伪满洲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牡丹江管理局领导，直到1945年8月15日东北光复。

通化放送局

通化放送局于1940年11月10日开始播音，呼号MTTY，发射功率10千瓦，频率1035千赫。地址在通化大桥区甲58号，后迁至通化市西关外（现新华大街隆发委）。

通化放送局初期，采用汉语、日语混合广播。不久，又增设一部10千瓦发射机，频率725千赫，开始办两套节目，分第一广播（1035千赫）和第二广播（725千赫）。1941年12月15日，伪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分配给该台一部50千瓦广播发射机，加强了汉语广播。

通化放送局隶属伪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奉天管理局领导。

（摘自《吉林省志卷四十一，新闻事业志广播电视道审稿》）

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广播

赵家斌*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南京蒋介石政府不抵抗主义下，东北大好河山很快地沦陷于日军铁蹄蹂躏之下，接着日本帝国主义便按照它的既定侵略计划，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

伪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马上与这个伪政权签订一项协定，日方出资1亿元，伪方出资6000万元，合组满洲电信电话株式

* 笔者曾任职于伪“哈尔滨中央放送局”及“新京放送总局”。

会社。

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成立后，即将东北（辽、黑、吉、热四省）各地的电报电话局以及沈阳、长春、哈尔滨的广播电台掠夺过去，这样，电器系统的通信事业，遂为日人一手所操纵。

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统辖东北电器通信事业达14年之久。其第一任总裁为广濑寿助中将，他曾担任过江桥血战的指挥官；第二任总裁为山田乙三中将，过去他曾是日本关东军的防卫军司令官（关东军的编制分为野战军和防卫军两方面），不用说是大批日人拥入电电会社并把持所有部门，即由总裁的任命来看，亦可想见日本侵略者对于电器通信事业的异常重视。

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的业务，分为三个部门，这就是电报、电话和广播（放送）。

在广播方面，最初于电电本社内，置有放送部统辖放送、普及、业务等各课。在放送课内，分为第一放送系和第二放送系，直接指挥着整个东北广播事业。

当时在东北全境内，置有四个中央放送局，即长春（伪国成立后改为新京）中央放送局，奉天（辽宁）中央放送局，大连中央放送局、哈尔滨中央放送局。除中央放送局外，尚有安东放送局、营口放送局、锦州放送局、承德放送局、海拉尔放送局、齐齐哈尔放送局、北安放送局、佳木斯放送局，以后又陆续建立了吉林放送局、通化放送局、牡丹江放送局、抚顺放送局、鞍山放送局等各地方局。这样就形成一个以长春为中心的四向放射的广播网。中央放送局虽然有四个，但是长春中央放送局则处于首要地位。

长春中央放送局置有庶务、编成、报道、学艺、国际、技术等课，其他中央放送局设有庶务、放送、技术三课，至于地方放送局则不设什么课。

广播使用的语言，分为日语、汉语（当时称满语）两种，日语广播叫第一放送，以来居的日人为听取对象。汉语广播叫作第二放送，以东北人为听取对象。因为哈尔滨有许多白俄居留，为了向他们进行日伪的宣传攻势，所以哈尔滨中央放送局除第一放送和第二放送外，又单独开辟第三放送、增添了俄语广播。

长春中央放送局的国际课，是为着向东北以外各地进行广播宣传而设的，主要是面向中国内地和南洋一带，使用的也是日语和汉语。

为了加强对广播事业的统治，1944年，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改变了内部的编制，撤销了本社的放送部及其所属各课，将长春的中央放送局升格为放送总局，在放送总局内，置有监理课（原编成课合并在内）、庶务课、普及课、报道课、学艺课、国际课、技术课以及查阅室等各课室。原放送部长董毓舒为放送总局长，原长春中央放送局的金泽党太郎和刘多三局长为总局的副局长。另外，并于报道课、学艺课、国际课、普及课，分别增设一名副课长，由东北人担任。日人为加强文化的侵略和统治，此前曾计划建立一所放送会馆，建筑资金预定900万元，使之成为伪国的“最高文化殿堂”，可是由于日本侵华战争越来越陷于深渊之中，所以这项计划就束之高阁了。

在广播内容方面，日人把它分为三个部分，这就是报道放送，教养放送和慰安放送。所谓报道放送，包括一切报道性质的广播，如新闻报道、经济行情、各种实况、天气预报、节日预报等。所谓教养放送，也就是所谓有教育意义的广播，如各种讲演、学校放送、儿童时间等类属之。所谓慰安放送，系指一切文娱节目而言，如京剧、梆子、广播剧（当时叫放送剧）、广播小说、音乐、歌曲、合唱、评词、影戏、相声、大鼓等等。报道放送的资料，需要取之于国通社（“满洲国通讯社”）的稿

件，有时也采取一些报纸上的材料。讲演和学校放送则根据讲题邀请当时各方面有关的人来局广播。儿童时间的内容，有讲话也有文娱，邀请有关教师或小学学生担当。至于慰安报道的演出，则邀请各地的文娱团体和艺人担当。当时能够提供各种节目的广播电台，除长春、沈阳、大连、哈尔滨各中央局外，在地方局方面，安东、锦州、齐齐哈尔、吉林、营口也能提供一些。各种广播演出团体，如京剧团、话剧团、音乐团、合唱队等，多系当地所谓该项文娱爱好者在放送总局的支持下，所组成的。放送局所以鼓励这种演艺团体的组成，目的在于使他们为广播效力。

为了征集广播脚本，在长春本社放送课的倡议下，曾酝酿了一个所谓“文协”的组织，以便使当时能够写作的人们提供一些话剧、小说等稿本，藉以救济他们的贫困的“新演艺”的内容。由于应征稿本寥若星辰，不久这个“文协”也就不了了之了。

关于节目的编排，先是由本社的放送课主持，以后这项工作便移于长春中央放送总局的编成课（监理课成立后，归该课的编成组）了。其程序为能提供节目的各局，于前一月初即须将欲担当的广播节目作成提案并附有内容说明提交长春的中央放送总局，于是编成课召集有关人员举行编成会议，对各局所提节目加以取舍。会议后，编成课即根据会议所采取的节目，编制下月全月份的（按日按时的）广播分担表册分发各局，这样各局于前一月的下旬即可得将来月的广播节目表，各局就可按此表着手本局担当节目的准备了。准备完了后，再通报长春局的编成课，编成课根据各局的节目担当通报制成每日广播节目表，先几日知照各局，至此广播节目遂最后确定。长春局担当的节目广播时用电波直接向各地送出，至于其他各局担当的节目广

播，则先由电波送到长春局，然后再由长春局转送各地。所有这些，都是控制各局广播的一种措施。

在日伪统治下，广播的编成方针，也是遵循日伪的国策进行的，新闻报道是如此，一些讲演多是如此，就是在文娱节目中，同样要夹杂一些“日满协和”、“王道政治”、“大东亚共荣圈”以及“国兵法”、“粮谷出荷”等思想内容。为了歌颂日本的所谓“武运”，不但当日军攻占新加坡之日，来了一个临时特辑节目，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第一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和第二任司令长官古贺峰一前后战死的时候，也都临时编排了特辑节目，以吹嘘日本的“大和魂”和“武士道”精神的方法，来掩饰他们的败仗。

日伪统治者对于广播内容是严密监视的。根据日伪双方的协定，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是要受着伪满交通部监督的。伪满交通部为了监视广播内容，特在各地的邮政管理局内设一电政科，科长由日人担任，凡一切广播稿件，事先必须送到电政科审查，不然是不能广播的。电政科可以对原稿的某些字句提出修改意见，也可以勒令禁止广播，不仅对于广播稿件详加检查，即对于广播使用的唱盘的审查亦毫不放松。如京剧里的《苏武牧羊》是不准广播的，因为有“降低皇家尊严”的嫌疑，歌曲里的《大路歌》、《开路先锋》是在禁播之列的，因为它唱出了劳动人民的心声……诸如此类，不下数百余种。再举一例，亦可说明个中情形的一般。大概在1943年春季的某月份里，在广播节目中添了一项趣味讲话，譬如讲些集邮、联话等有趣的故事。某次哈尔滨局担当的趣味讲话是《南船北马》，内容不过是说些船马的故事。可是电政科竟认为这个题材不对头，有违国情，届时打来电话通知禁止广播，当时广播员与之争执多次未下，最后终于不顾电政科的拦阻广播出去了。第二天，日本

宪兵队打来电话，找广播此稿的主持人询问情节，由此可见日伪当局对于广播内容的严密监视。由于放送局与电政科时常发生矛盾、冲突、口角，而各地电政科的措施又多不一致，所以在伪满国务院弘报处成立后，为了加强思想文化统治，对于广播事业也在着手干预了。弘报处对各地电政科有统一指示，全盘审定了禁播唱片，然后由各电政科通知各放送局照行。至于讲稿与剧本等仍由各电政科就地审阅。长春局为了免除与电政科之间的磨擦，自己成立了一个查阅室，所有广播稿件由自己审查，但要对伪弘报处负责，广播完了后，将原稿送交该处备查。

日伪警宪每年都要实行春秋两次大检举，逮捕他们所谓的“思想犯”，对于供职于放送局的中国人，自然也是他们的注目之的。1942年秋，长春局的崔国治和哈尔滨局的赵文逸同时被逮捕了，1945年春，长春局的张万喜、杨文元也先后被逮捕了，他们被关押在首都警察厅好几个月，受到多次的严刑拷问。

在广播节目中，时而又作着舞台中继（在剧场里播送戏剧）的编排，尤其是有名的艺人出演时。如伪满演艺协会（艺人的统治机构），为了多赚钱，曾先后邀请北京的马连良剧团、叶盛章剧团、李玉茹剧团、言慧珠剧团等来东北演唱，所到之处如沈阳、长春，哈尔滨各地，放送局都作了舞台中继的广播，藉以取悦听户，同时对于无线电收音机的推销，无形中也起着宣传广告的作用。

日伪统治下的广播收听户，是要缴纳听取费的，其金额是每户每月一元，实质上这就是课收音机所有者每年12元的税金。为了扩大听取面，以便多所渔利，普及课进行了积极的推销活动，曾以“月赋”亦即分期按日缴款的方法出售收音机。至于收音机的生产，在伪国内并没有建立什么制造厂，仅在日本

国内进行，运到伪满洲国后只是装配而已。所生产的收音机分为“国民型”、“标准型”、“斯巴型”等几种，而“国民型”又有一至七号，“标准型”一至六号等不同的类型，其中以“斯巴型”的质量较优，但是“斯巴型”除日本人外是很难买到的。

日的当局以广播为防空司令塔，每年都有一次或两次防空演习，“敌机侵入”、“空袭警报”、“疏散”、“待避”等一系列讯号，都利用广播传达各处使所有机关、居民都按照这些讯号而有所行止。他们不知费了多少时间精力人力财力从事这种防空准备，不过完全出于他们意料之外，结果并没发生任何作用，只是徒劳心力而已。

1945年8月8日，苏联根据波茨坦会议决定，对日宣战。得到此消息，电电总裁山田乙三马上召集所属职员在放送总局集合，时间是下半夜一点左右。

山田的讲话不长，只是说：苏联政府已经对日宣战，在此情形下，全体员工要沉着应战，严守各个岗位，百万关东军必能克尽职，收到满意的战果等等。山田的这次讲话，不只是对着长春的电信员工，同时通过短波向各地的电电职工一道播送出去。

空气一天一天地紧张起来，“敌机侵入”、“空袭警报”的信号不断从广播传播出去，可是战况究竟如何，只有日本人会知道一些，在广播的报道中，是没有这方面材料的。8月10日以后，有些蛛丝马迹显露出来了，在电电本社和放送总局的走廊两旁以及门里门外，零零乱乱地堆置许多电信器材，据说几天以后，便要转移到通化去，日军将死守通化这条最后防线。

8月15日正午，山田又召集全体员工再集合于演奏室，员工都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结果，是捧读日皇颁布的投降“诏书”。

自此，“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随着伪满的垮台而作鸟兽散了。

回忆伪满洲国“新京放送局”

陈鸿钧

这里所写系就个人所知1941年到1945年“八·一五”新京放送局的情况，至于它何时成立以及在1941年4月以前它的活动，因个人不详，这里付诸阙为。

隶属关系

该广播电台直属于伪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即伪满电报电话公司。该公司直辖三个方面的业务，广播即其中之一。为了专门管理该电台以及各地电台业务，该公司设放送部，放送部下设放送课，就播音节目等业务对各地电台进行指挥管理，该中央电台业务、设备措施等，直接受伪国务院弘报处统辖，该处有一参事官，还有一事务官对播音节目直接进行监听，发号施令，而其太上皇则是日本关东军报导处，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军方人员直接去电台，向那里的日本人台长指挥布置，副台长中国人听从指挥，在中国语广播方面进行贯彻。

关于该电台机构、人事、业务

该电台设日本人台长1人，中国人副台长1人，台长之下设（用原名称）“编成课”，由一叫町田的日本人任课长（这个课不设中国人副课长），掌管电台每月全部播音节目与重要事项的确

定与监督实施。该电台主要有新闻报导、讲话、音乐演艺、儿童节目及对重庆播音。这个编成课，主要是确定、编制每月的宣传报导方针及主要内容，并监督实施的。因当时敌伪广播对象，一是对日本人，另一是对中国人（被称“满洲人”），所以该课每月要编完日本人收听的节目与中国人收听的节目，该课课长是敌军方十分重视的，因为他要代表关东军严格执行关东军和伪满政府的宣传报导方针的。

该电台在业务方面设“报导”、“学艺”和“国际”三个课，在上述编成课之下，执行，实施每个月的项目。

（一）报导课（意即新闻报导科）

这个课和敌伪一般“报社”同样，是通过电波向全东北进行时事宣传报导的，中设两个股，一股是日语宣传报导，另一股是汉语宣传报导，先是由一名人事课长总管，分设两个股长，每个股有股长2人，正的是日本人，副的是中国人，后改为课长（日本人）、副课长（中国人），它的新闻报导的材料来源，是伪满洲国通讯社每天即发的“满洲国通讯”，这是日文稿，在中文广播时，是由这里的中国人译成中文报导材料，然后每天分早、午、晚由这里的播音员通过电波进行报导。

（二）学艺课（包括讲演、音乐、演艺、儿童节目）

该课与上述“报导课”同样，先设一个日本人“课长”，分两个股，每股正副两个股长。后来也改为课长（日本人）、副课长（中国人）。在负责中文广播股里还有一个日本人，没有名义，但全面监督中国人的情况，两个方面的节目种类大致一致，在中文节目里有讲话、演艺（其中包括话剧、京剧、相声、大鼓等）、音乐（中国音乐、西洋音乐）、儿童节目，有时进行现场广播，各种节目各有人联系、执行。

这里的“讲话”被看成是重要节目，主要是用来进行敌伪

宣传的，有时由伪国的“要人”讲话，如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伪“大臣”以及伪“协理会”主要大员，在伪国的什么纪念日子里，由伪政府直接安排，其讲话人由电台“隆重”迎送，其他一般的“讲话”人选，也都经该台台长、编成课长等决定，进行接待，该电台各业务“课”、“股”每个月征集一次节目，提案由各股人员提出，编成课选用，作为下一月节目。

各种演艺和音乐节目都由专业个人或团体演出，在当时的专业团体中，有“文艺话剧团”、“京剧团”、“广东音乐会”、“吹奏乐团”等，各演出团体和个人在演出之后由该电台付给一定的报酬。

在参加播送这样的节目的中国人中间，除极个别的人以外，大多都是心中抑郁，心怀不满。前述“学艺课”的那个课长，有一次就对着几个中国人厉声地说：“你们的思想里都反满抗日，这个我知道！但是这不要紧，你们得给我干！不干不行！”在敌伪统治后期，中国人职员家属都被安排住到一所住宅里去。这些人们每天晚饭后常到一起谈唠，发泄个人的郁闷和忿恨，在夜里很多人打麻将，到深夜，才在电台调整室中偷听祖国抗战的消息。

（三）国际课

这是该电台对国外进行广播的一个机关，有一个日本人课长，成员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用英语对海外进行播音的，这一部分人占该课成员的多数，使用打字机，打英语稿件和用英语播音都是由这些人来进行；另一部分是中国人，大约有五六个。另外还有一个懂汉语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坐在一起，这些中国人和报道课的人员同样，翻译伪满洲国通讯社的日文稿子，译稿交日本人审阅，最后交播音员对重庆方面进行播音。该课课长（日本人）有时写时事评论文章，交由中国人（副课长）译成汉

语，然后播音。所有的稿件在播音前，一律交由懂中文的日本人审阅。

该课有一个译稿的中国人，一次他喝醉酒，归途中，说出他做了日本人的特务。

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的是法西斯统治，1945年“八·一五”后的二三天，在广播电台“学艺课”做过副课长的一个日本人说：首都警察厅特高课的“黑名单”上有4个人原定同年10月逮捕，这4个人中有两个人是学艺课的。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的一段时间里，电台由苏联红军控制，在此过渡期间，该电台保持着少量不同内容的节目播音。

日伪时期承德的广播事业

张星增 王立军

本世纪20年代初，世界上出现广播电台。承德自30年代建立无线广播，至今已有50年的历史了。50年来承德的广播事业，经历了日伪、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三个时期。

日军侵占承德后，1936年1月1日便在承德市南营子大街（现承德南营子五金商店处）成立ラミン才营业所（即无线电营业所），负责收音机整机、零配件的经销和修理业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为了进一步推行其侵略政策，扩大其宣传阵地，于同年7月22日在承德市石洞子沟北山坡下，成立了伪电信电报株式会社承德放送局，开办了日语广播节目。呼号为MTHY，使用50千瓦发射机，波长328米，频率915千赫，埋设地网300平方米，木杆水平天线

高度80米，发射机为自激变调式的中波广播。主要是转播伪满新京（长春）、沈阳和大连放送局的日语广播，没有自办节目。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为强化对中国人民的奴化教育，又于同年12月15日，在承德放送局开办第二广播，增加了华语广播节目，发射机功率扩大到1000千瓦，频率是1270千赫，发射台址仍在承德市石洞子沟北山坡下，受信所（即信号接收点）在石洞子沟南侧傅家沟内（现长途线务站院内）。1942年台（局）地址迁至承德市小佟沟南山（现在地区广播电视局院内）。

1943年伪承德放送局升格为承德中央放送局，下属赤峰放送局（建于1944年9月1日，台址在赤峰前亭街甲409号，呼号为MTEY）和平泉放送局（未建成日本就投降了）。

伪承德中央放送局的机构设置有机务系、技术系、放送系、受信所和普及课（即原无线电营业所，于1942年改为承德放送普及局，1945年夏并入伪承德放送局）。课（系）以上负责人都是日本人，中国人在里边担任的都是一般工作人员，先后担任该局局长的有大家敬之、连川亮吉和玉萃仲吾。

（摘自《承德文史》第五辑）

日伪统治时期鞍山的无线广播

鞍山市广播电视局史志编辑室

由于鞍山特定的历史和地理条件，决定了鞍山无线电广播产生于日伪统治者即将覆灭的前夕。

盛产钢铁的鞍山，20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就伸进了魔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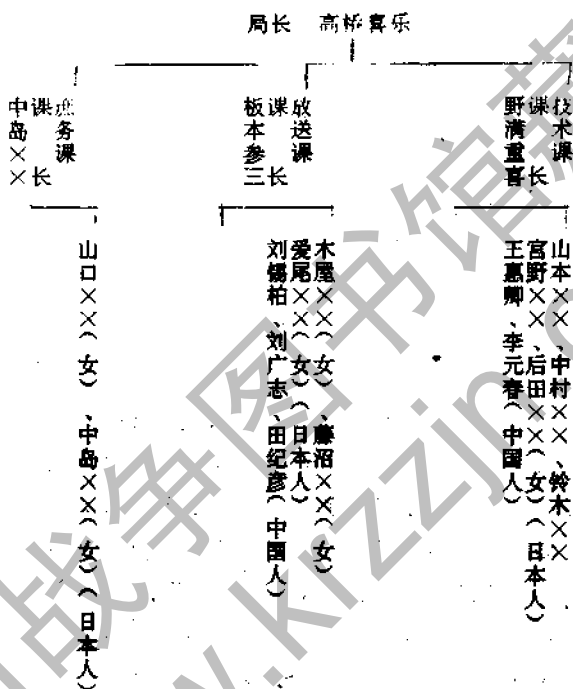
“九·一八”事变后，侵略者把鞍钢（日伪时期称“昭和制钢所”）扩建为殖民地性质的联合企业，成为它的重要钢铁基地之一。但当时在东北来说，鞍山毕竟只是一个工矿区，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不如沈阳、大连、营口等城市，所以作为它的现代化宣传工具的无线电台的创建，时间比那些地方晚一些。这以前，在鞍山许多日本人和少数中国人家里已经陆续有了收音机（据昭和14年即1939年《满洲放送年鉴》的统计，当时鞍山日本人6020户中有收音机的有2061户，中国人18298户中有收音机的271户。另据“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满洲放送听取者数分布图》1940年统计，当时鞍山共有收听户4560个，其中日本人3590户，中国人970户）。为此，早在1937年就设立了“鞍山ラミソオ（无线电）营业所”1942年改为“鞍山放送普及局”，它的业务除出售和修理收音机外，还收取收听费。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鞍山是日军钢铁供应基地，连续遭到美国飞机空袭。为了加强防空和欺骗宣传，他们就设立了“鞍山放送局（广播电台）”。正如《东北经济小丛书·电信》所说：“……又于本溪湖、吉林、兴安、鞍山及抚顺分别成立广播电台，此乃为避免空袭，由大电力广播转变为微电力广播，故有此卫星式广播电台之增设也。”

“鞍山放送局”筹建于1944年初，这年9月1日正式成立。地址在当时的长大区“鞍山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简称“电电”）日本人独身宿舍“电电一心寮”，借那里的三个房间作为临时局址（一是办公室，一是技术室即机房，一是放送室即播音室）。主要设备是一台功率为10千瓦的发射机，发射频率为725千赫，呼号为MTJY。广播主要用日语，时间一天三次，早晨5：30—7：30时，中午11：30—13：00时，晚间17：30—21：00

时。其内容主要是转播奉天（沈阳）放送局节目，也有些地方新闻。21点以后，用华语广播半个小时，内容有新闻（大都是由日语新闻翻译过来的）、通知、唱片等。遇有美机空袭，就播送空袭警报，先用日语，后用华语。放送局有两台电话直接日伪鞍山南部防卫司令部，一有空袭情况，伪司令部马上通知放送局；如果飞机接近鞍山了，就再次通知放送局马上发出警报。当时鞍山街上安有大喇叭，一广播居民都知道了。

这样简陋的设备，显然不能适应当时侵略者的需要。于是，他们同时又在附近兴建了一个比较正规的建筑（在现解放路），占地约500平方米，有大、小播音室各一个，机房、办公室各一个，还有休息室、局长室、锅炉房等。1945年春，放送局迁到这个新址。广播用的发射机是从日本运来的两部50千瓦机器。由于两部机器安装的电子管不同，一部实际输出功率较大，另一部功率较小。这时就把日语和华语节目分开广播，功率较大的机器用来播日语节目，功率较小的机器用来播华语节目。前者频率仍为725千赫，后者为1160千赫。呼号都是MTJY。两套节目内容和以前差不多，仍然都是以转播奉天放送局节目为主。鞍山放送局当时的机构、人员情况，据曾在该局工作过的王大光（即王惠卿）等的回忆如下（见表）：

日伪鞍山放送局机构、人员表（1945年“八·一五”前）



此外，属“放送普及局”的收费人员有：赵仙洲、程志金及两名日本人；修理人员有：崔庆多、陈福志、刘春秀、常凤书、张德庆。

1945年8月15日，从广播里传出日本天皇宣布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的诏书，鞍山放送局的日本人听了痛哭流涕；中国工作人员听了都很高兴，庆贺祖国的光复。鞍山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妄图窃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搞起了什么“治安维持委员会”、“国民党市党部”等。8月下旬，苏军进驻

鞍山，日军被迫缴械，成立“卫戍司令部”。不过，这些组织一时还没有介入放送局，

10月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纵队和冀热辽第16军分区的官兵在鞍山会合。在改编了鞍山的保安旅，接收了日伪“昭和制钢所”等之后，随即于10月24日派人接收了鞍山放送局，改称“鞍山广播电台”，并派靳纯英为台长。我党领导下的鞍山人民广播事业由此诞生。

（摘自《鞍山市广播电视志》）

哈尔滨放送局 和哈尔滨中央放送局时期

尔泰 丛林

口琴社演播《沈阳月》

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1932年2月5日被日本侵略军占领，7月改称哈尔滨放送局，恢复了广播。1933年9月，伪满洲国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统一接管了东北的广播电台，哈尔滨放送局也就成为满洲国电所属的一个部门了。1934年7月，新京（长春）到哈尔滨的广播专用中继线路建成，开始实行全满联网广播。

哈尔滨放送局的所有广播节目都由日本人来办，即或是汉语（汉语）节目，也全由日本人来搞。所以哈尔滨放送局的广播节目怪声怪气，奇腔异调，它播发出来的声音同中国人发出的声音似乎隔着一道鸿沟，不太容易进入中国人的耳朵，广播收不到他们预想的效果。为了扭转这种情况，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哈尔滨放送局开始让中国人参与办广播。因此逐渐请一

些中国人演播节目，单独播出或向联网中继输出，广播到全满洲去。

1935年秋后，哈尔滨放送局请哈尔滨口琴社来演播口琴曲。他们演奏了《沈阳月》、《轻骑兵》、《快乐的铜匠》等曲子，进行了反满抗日的宣传。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哈尔滨口琴社事件的一个重要起因。《沈阳月》是很有思想性、战斗性的大型口琴协奏曲，原名叫《战场月》，由于乐曲的名字太引人注意，演播时改叫《沈阳月》。它描述的是1931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向沈阳北大营进攻时，爱国官兵奋起抵抗，被蒋介石强令撤退的悲愤感情。这次哈尔滨放送局广播它，人们从收音机旁听到了《沈阳月》的吹奏：开始由口琴社的几个队员吹出缓慢而低沉的声音，这声音的音调逐渐提高，接着更多的队员逐渐跟上来，一起合奏。人们听去，真像一轮明月从东方冉冉升起。演奏向下进行，声调发生了变化，有如暴风骤雨袭来，阴森可怖；继而有如冷泉在幽谷中呜咽，时而有如闷雷在空中滚动，时而又如壮士面对易水而悲歌……这首口琴协奏曲，把人们推回到历史的悲剧场面，使人回忆起沦亡之恨，激起了人们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情绪和爱国的深沉情感。听众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民族意识，乐曲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演奏这首乐曲时，队员们各个面容严肃，蕴含着怒气。在演奏声调激昂凄绝的时候，指挥精心指点，眼角都闪着泪花。

原来哈尔滨口琴社是在共产党员姜椿芳、金剑啸、任震英组织支持下进行活动的。口琴社以教授口琴、演奏口琴为纽带，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在青年中进行工作，曾经动员口琴社的社员捐赠一部分钱，支持党办的其他宣传刊物。口琴社在社会上的活动，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他们察觉到背后有共产党人的活动，口琴社是和反满抗日有关的组织。演奏的口琴曲在思想

内容上也是不能允许的。因此，1937年4月，敌人对哈尔滨口琴社进行了法西斯镇压。除了1936年袁亚成与陈娟离开哈尔滨回上海之外，所有的口琴社社员全部被捕。敌人严刑拷打每一个社员，也没有抓到任何把柄。最后日本人把口琴队队长侯小古押到警察局地下室枪毙了，王佳文被判5年徒刑，口琴社音乐顾问刘性诚及其他口琴社成员，被折磨了几个月之后释放了。后来，刘性诚又来哈尔滨中央放送局MTFY合唱团当了“嘱托”，带领这个合唱团演唱古典歌曲，坚持不演黄色的流行歌曲。因为刘性诚参加过哈尔滨口琴社，日本人对他总是放心不下，甚至让人监视他的活动，生怕再有像《沈阳月》一类的乐曲或歌曲，通过广播电台广播出去。但1938年7月8日口琴曲《沈阳月》又以其原名《战场月》在广播中播放出来了，斗争仍微妙地进行着。这充分体现了广播电台内部中国人斗争的顽强与奇妙。

《南船北马》风波

哈尔滨放送局1934年7月实行全满联网广播。由满洲电报株式会社放送课组织全东北各大城市的放送局，分别制作节目，通过中继线传给新京（长春），再通过中继线同时传给各放送局，用无线电波发射出去。1938年5月，哈尔滨放送局改为哈尔滨中央放送局，1941年3月，迁到松花江街601号新厅址，还是进行全满联网广播。1942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播由放送总局统一安排。各中央放送局仍然分担制作广播节目的任务。

当时，哈尔滨市私立龙光学校校长王雁秋，给哈尔滨中央放送局“节目编成”边永禄送去一篇广播稿，题目是《南船北马》。

表面上看这是一篇有点趣味性的闲话，讲的是各个地方人

们的不同习惯。南方水多到处是河沟港叉，出门总得划船；北方地广路长，外出常常需要骑马。其实王雁秋是在抒发一种怀念国家的情绪，用说趣文闲话的方式，引起广大听众时时想念我们和划船的南方是一奶同胞，而且更不要忘记北方骑马的辽阔土地正是祖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边永禄编好了这篇稿以后向上送审，只等稿件被采用以后，编辑通知王雁秋到时来电台播讲。

其实《南船北马》稿子送邮政管理局电政科业务股第二放送监督室审阅时，收发监听郝清廉没有看完稿子，所以没有盖上“供览”橡皮戳子，股长、课长自然也就没有看。哈尔滨中央放送局第二放送（汉语）负责《南船北马》的“节目编成”边永禄，在节目播出前30分钟打电话问郝清廉，稿子可不可以让王雁秋播出？郝清廉没有看完稿子，就小心起来。因为曾有一次市长到放送局讲话，秘书迟送了讲话稿，郝清廉按“编成”意见盖了“供览”橡皮戳，股长、课长也都签了字，但讲出的话则有“希特勒欲涂欧洲版图于一色”词语，被上司追问，认为市长讲话影响了日德轴心国的国际关系，不久市长被撤职，而郝清廉也跟着吃了一惊。太平洋战争爆发，放送管理得更严了，所以这次对王雁秋广播稿郝清廉因未细看，只好推说稿子内容是胡扯，文不对题，暂且不放，让“编成”边永禄另换节目。郝清廉的“暂且不放”说起来容易，但仅剩30分钟，是无论如何也来不及了，边永禄心里自然十分着急。于是他就向郝清廉解释，稿件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额外的胡诌，认为可以播放。郝清廉说：“你放你负责！”边永禄一听，这话十分刺耳，觉得话里充满威胁的口吻，也便动起气来，随口答道：“我负责！”一气之下，到时间就让王雁秋进播音室去讲。

收音机里清晰地传出王雁秋讲《南船北马》的声音。没有

几分钟的工夫，第二放送办公室的电话铃哇哇地响起来，响得又急又惨。边永禄意识到是郝清廉来的电话，硬挺着不接。等王雁秋把稿子播讲完了，边永禄才接电话。郝清廉在电话中叫边永禄待处理，把弦绷得更紧了。这可吓坏了王雁秋。边永禄想，一不做，二不休，何不来个先下手为强呢。于是边永禄把全部经过告诉了第二放送主事赵忠恕，赵忠恕和边永禄又找了放送局长日本人高桥将武，口口咬定邮政管理局方面有意刁难。一席话说得高桥为放送局的人撑腰，他主动和邮政管理局的日本人联系，争是非，讲道理，事情闹得挺大。邮政管理局方面知道高桥将武有实力，他的哥哥在警备队当大佐；郝清廉也意识到放送局方面的抗争力量很大，亦属不可轻易触犯，因此，他自己也就先放软了态度。王雁秋觉得事情十分难办，真地闹将起来，自己必得首当其冲，弄不好，有坐牢的危险。所以他积极从中活动，通过关系通融，在一家大饭店摆了两桌酒席，把放送局方面的和邮政管理局方面的有关人员都请到，调和了两方面的关系，才算把事情压了下来。

不打不成交，以后郝清廉对放送局方面的事好办多了，管理上放松许多，遇事总是商量着办。后来河南新民会邢幼洁访问“满洲国”，到哈尔滨放送局讲话，稿子里边大讲岳飞，讲民族气节；放送局的“编成”知道邢幼洁虽然是汉奸，但他在广播中讲岳飞，讲气节总比其他更好，就同意邢幼洁来讲话。讲话稿送上邮政管理局，郝清廉看了，电话打到放送局进行商量，放送局方面说，你若给他删了，邢幼洁就不讲了，并且说他发了脾气，骂道：“怎么连祖宗都可以不尊崇了吗？”结果郝清廉给讲话稿盖了“供览”的橡皮戳，又说服了上边的日本人，邢幼洁还是按原讲话稿讲了。还有一次，新京（长春）中央放送局来电话，要哈尔滨中央放送局就交“出荷粮”问题组织制作

一个节目，鼓动中国人交“出荷粮”，哈尔滨中央放送局以需要人多，眼下人手不够难以制作作为借口加以抵制。这事虽然与郝清廉无直接关系，但他看在眼里，已经意识到哈尔滨中央放送局的中国人在进行合法的抵制。郝清廉也在那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做不知。

FY 合唱团

FY 是哈尔滨中央放送局MTFY 代号的最后两个字母，Y 是放送的意思，F 是哈尔滨放送局的第次号，FY 合唱团就是哈尔滨放送合唱团。这个合唱团的成员，有的是电台的人，有的是业余音乐爱好者。它由放送局拨款，来完成节目制作，由放送局专属而又不在于编。这个合唱团的嘱托叫刘忠（即刘性诚），是一位音乐家。他原是一个中学的音乐教员，为许多古诗词谱过曲子，如柳永的《雨霖铃》、李清照的《菩萨蛮》、李煜的《虞美人》、王维的《阳关三叠》，还谱过诗人徐志摩的《快回家吧，姑娘》等。这些诗词中许多是“托儿女之辞，写君臣之事”的。刘忠1935年参加过“哈尔滨口琴社”和任白鹤一起当音乐顾问，指导过《沈阳月》的排练演出，他参与《白鸥弦组》经常在电台演出。1937年刘忠被日本警察机关逮捕，在狱中匪刑吊打，灌辣椒水，折磨了几个月，终因没有抓住什么切实的把柄而被释放。但仍是日本人那里的挂号人物，属于不放心分子。FY合唱团的许多成员，音乐修养都很高，像指挥王钧鼎（王奎丁、王一丁），他指挥过我国音乐家赵元任的《海韵》大合唱，由俄国人交响乐队伴奏。《海韵》的内容，反映浪漫的少女，在海边寻找希望，然而被海浪吞噬。意境深远，含蕴丰富，音乐气势雄浑，指挥难度很大。FY合唱团排练时，刘忠就推荐他的学生王钧鼎来指挥。当时外国人，特别是俄国人不相

信中国人能够指挥得了、指挥得好。但是，王钧鼎指挥得出人意外的好，他充分发挥其指挥才能，和谐而适度，旋律优美。《海韵》大合唱公演时外国人感到十分惊讶，不断地叫好。首演结束时，那些俄国人激动不已，掌声经久不息。王钧鼎还在广播电台讲《音乐欣赏》，每周一讲，讲贝多芬、莫扎特等大音乐家及其作品。讲的过程中，讲到法国革命，讲反映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作品，边放音乐边讲解，有时影射鞭笞日本侵略者。为此，哈尔滨宪兵队名册上，王钧鼎已被画上了两个圈，然而，王钧鼎一如既往，照例讲下去，他最看不起向日本侵略者出卖灵魂的徐曼飞等，不久王钧鼎的音乐“嘱托”被解除。

FY 合唱团人多时达五六十人，哈尔滨的许多音乐爱好者，特别是职员、教员来参加的很多。FY 合唱团也培养出一批音乐人才。那时候日本人对于广播有严格的“放送规则”，共有 54 条，其中第 32 条又有 18 项“禁止放送”的明文。例如第 3 项不准“宣传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之理论以至战略战术或煽动其运动实行或支持此种主义之团体”；第 4 项不准“煽动暴力主义、直接行动，大众暴动等或支持有此种主义之团体”；第 5 项不准宣传“使国家存立基础之动摇之事项”等等，控制十分严密。所以 FY 合唱团制作的节目，除了必须打的幌子以外，多是中性的、庄严的歌曲，或者演唱一些外国的著名歌曲，像《魔王》、《菩提树》、《流浪者之歌》等等，抵制下流黄色的歌曲。这样，放送局觉得有不放心和不满足的地方，他们想利用“古风音乐会”与 FY 合唱团相并立，以期掺入一些为日本统治者所得意的节目，同时在两相比照中，钳制 FY 合唱团不至于走得太远。这个“古风音乐会”宣称专门演奏国乐，而实际上，它有的时候不伦不类。国乐应该是我国传统的管弦乐器，可是这个乐团演奏中，却夹杂着中提琴和一些西方乐器，成了一个“杂烩”。古

风音乐会常有一个警视厅推荐来的“嘱托”出现，他有时穿着警尉的制服，有时穿着时髦的西装，脚上穿着半截小黑皮靴。这个音乐会中有个日本人松永，他是市公署的职员，一演出就穿和服，有时也穿警佐制服。警视厅推荐的那个“嘱托”虽然也参与古风音乐会这个管弦乐团演奏节目，但他本人不像其中的工作人员，而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没人敢问。因为人们对带警字的人都敬鬼神而远之，怀疑他的身份来历，是否系派遣来的坐探。这个“嘱托”在同仁中显威风，飞扬跋扈，没人敢惹。那时，办公室里办公桌是按使用人的职务、资格排列的，有职衔的依照大小排列在前，没有职衔的排列在后。有一回，刘忠同王钧鼎谈话，古风音乐会的那“嘱托”没在屋，刘忠无意中坐到了这个“嘱托”的位置上了。他俩唠着唠着这个“嘱托”回来了，他们也没有注意。而这个“嘱托”一见，立刻火冒三丈，大发雷霆，破口骂刘忠算什么东西，并且阴险而又狠毒地说：“充兵队难道没把你的屁股翻过来吗！”露出一副凶相。对于这种人，刘忠只是用沉默的方法来蔑视他而离开了办公室。在刘忠他们的FY合唱团排练或演播时，那“嘱托”常去演奏室的观听席参观。人们都知道，这个“嘱托”混迹古风音乐会不过是埋个隐身草，去参观实际上是进行监视。但是刘忠FY合唱团还是以合法的形式演唱了一些李清照和李后主的诗词，以图用它来感染人不忘国耻，唤起人们反抗日本殖民主义统治的意识。

广播剧《新天地》

1944年7月25日，哈尔滨中央放送局播出了一出广播剧《新天地》。那天是所谓“协和会”的创建日，晚7时在《儿童节目》时间里，向伪满全国广播。

《新天地》是一出喜闹剧，剧作者“孤帆”（即赵乃禾）。

这出广播剧的剧情大体是这样：在山村的一个院落中，杂居着几个民族的居民：有日本人、朝鲜人、俄国人和中国人。日本人是这个村子的村长。

山区每年都有山洪暴发，大家对于洪水都很恐惧。这一天日本人村长告诉大家今天晚上有特大山洪，人们要到村中一座石头房子里避难，要用砂袋加固房身，用砂袋堵严门窗，如果经不住这次洪水，那么大家就死在一起。于是全院的人都集拢到这座房子里，在恐惧的气氛中等待着命运的裁决。笃信天主教的俄国人在行将就死的时刻，良心发现，进行了忏悔。他说，过去他在村中干了坏事，卖牛奶，往里面兑凉水，很对不起大家，请求饶恕。屋里许多人幡然醒悟说，哦，确实是这样，好几个人喝牛奶闹肚子拉稀。接着朝鲜人也进行了忏悔，说他在村中卖大烟，进行贩毒活动，坑了不少人。正在这时，有个中国人又打喷嚏又淌泪，犯了大烟瘾，那个朝鲜人还上前去安慰，并且道歉，承认自己害了许多好人。见此情景，那个日本村长也深负歉疚地说，他在村中借教小孩子们学日语之故，接受了家长们送的许多钱物，而孩子也没教好，很不应该，对不住大家。就在忏悔的旋风越刮越烈的时候，那个俄国人说他干了很不道德的事，他跟朝鲜人的老婆通奸。朝鲜人一面羞恼难当，一面承认说，他早就觉得他家的小二长得像个二毛子。全屋子里边的人立即议论纷纷。大家长时间哄哄，有一个中国人气闷不过，就搬开砂袋，捅破窗子，居然有一束早晨的日光射入室内，新鲜空气和远近的鸡鸣声一齐钻进了这座黑暗的石头房子，外边根本没有什么山洪来过。这时大家都来问村长，这个日本人村长只得承认是骗匪蒙蔽了大家，其实并没有什么洪水。人们从恐惧中解放出来，又说笑起来，他们围着村长开玩笑，说：

“哈哈原来你是一个大骗子！”就在大家的喜闹狂笑中，结束了这出闹剧。

广播剧播送完了以后，新京（长春）“弘报处”裴事务官来了电话。电话打到哈尔滨邮政局电政科业务股第二放送监督室郝清廉那里，让把“孤帆”的广播剧《新天地》脚本明天寄往“弘报处”。郝清廉想问问出了什么问题，裴事务官没有理他。于是郝清廉头脑发胀，心情紧张起来，因为孤帆的稿件他没有盖章，只报来一个节目单。赵乃禾推说广播时参加播音的人要人手一份稿件，必须广播后才能把稿子送来。郝清廉以为那天是“协和会”成立纪念日，又是儿童节时间，加上广播剧剧名是“新天地”，这是伪满洲国国歌中的歌词，便一点也没想到内容会出问题。平时郝清廉同赵乃禾也有过来往，关系也不错，就允许他事后补交剧稿，并且郝清廉在儿童节广播时，没有监听，跑到地下室打乒乓球去了。现在上边一要稿子，按惯例一定是出事了，势必要牵连到专管监听的自己，所以郝清廉十分紧张。他想找赵乃禾，但赵已经下班了。郝清廉去找监督室主任韩承愈，韩承愈同裴事务官在日本留学时是同学，想求他给问一问稿子出了什么事。韩承愈一问，裴事务官说这出戏里面有反满抗日的言论，快把稿子送来。郝清廉一听，事关重大，这不仅是追不追究自己失职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赵乃禾的安危问题了。郝清廉心里反复考虑，渐渐地已经形成了一个主意。第二天一上班，郝清廉就找来了赵乃禾，问明了情况，才知道，广播剧把“满洲国”这个所谓“新天地”，写得一片漆黑，各种人都欺侮中国人，他们都是骗子，而最大的骗子是日本人。这个节目还正赶上纪念“协和会”建立，又对“全国”广播，实在是一起反满抗日的事件。郝清廉见到赵乃禾第一句话就说：“你实在是胆子太大了！”然后他让赵乃禾马上把原脚本收齐通通烧

毁，另写一个可以冒充而又没有把柄的脚本顶上。赵乃禾立刻动手另写一个脚本交上来。

伪满洲国对于广播控制很严。以广播稿件或广播节目的审查来说，它由国家行政当局的邮政管理局电政科业务股第二放送监督室来审查并监听。邮政管理局属伪满洲国交通部。与此同时，宪兵队、电电管理局，也都进行监督管理。另外还有伪满思想文化统治中枢——“国务院弘报处”总监督（广播稿件一律要求一式五份，由放送局庶务课填表编号呈送给邮政管理局、宪兵队和电电管理局，放送局留一份，广播者自己留一份）。稿子到了邮政管理局电政科的业务股第二（日语稿送第一、俄语稿送第三）监督室，经过收发监听，交“系”主管，送“系”主任，再交股长，上交事务官，上送科长（理事官），再送副局长、局长，层层审阅，签字盖章。

哈尔滨邮政管理局电政科对于哈尔滨中央放送局内部情况掌握得很清楚，知道这座广播电台里既有国民党系统的人物。也有倾向共产党系统的人物。因为邮政管理局的股长小西健治、科长安武柳条、局长植田三郎都是有证件的宪兵队本部的“嘱托”。宪兵队提供邮政管理局一个《要注意视察人名簿》，赵乃禾、边永禄、赵文选……都在册。据日本人掌握，赵乃禾毕业于哈尔滨铁路学院，会俄语，属工大系统倾向共产党方面的人物。他在社会上很活跃，喜欢戏剧，在《月光曲》、《烽火万里》等话剧中曾被特邀饰演主角。他演技好，声音宏亮，仪表扮相很帅，博得社会上各界的注目，受到一些青年的崇敬，他的演剧活动被视为有秘密结社之嫌。

如今，脚本稿子是后来送来的，第二放送监督室“供览”橡皮图章是可以加盖的，但是日本人小西股长、安武科长、植田局长的签字和盖章是不好办的，再加上新京（长春）“弘报处”

方面催要得紧，事情就更难了。郝清廉急得团团转，无奈只好去找第二放送监督室主任韩承愈。在郝清廉的观察中，韩承愈虽然在日本留过学，社会能量很大，但他对中国人因触犯日本人而获罪的总是肯于出力帮忙，甚至还担一点风险。其实韩承愈是一个通天人物。别看他留学日本，是技士十四级，他可是日本宪兵队的“满语”（汉语）教师，日本宪兵对他这位老师很尊敬，所以宪兵中有不少人是他的学生和朋友。韩承愈同邮政管理局局长关系又不一般，人人都知道他是嫡系。再加上他同新京“弘报处”的裴事务官等都是留日的同学，同新京的许多上层日本人有关系。郝清廉在韩承愈面前说，责任在自己身上，是自己同意赵乃禾后补交稿本的，没想到“弘报处”要看稿子，请韩承愈帮助斡旋。韩承愈就拿了稿本找局长植田三郎，说自己疏忽，没有及时上送，植田在稿子上签了字，科长、股长也没费许多唇舌都补签了字。随后，韩承愈给新京裴事务官去了电话，说明稿子股长、科长和局长都审阅过，没有什么大问题，劝裴事务官何必劳神多事，这才算把事情了结了。

不过，在日本人那里，赵乃禾被列入“紧急处置”人员名单之中。哈尔滨中央放送局局长高桥将武，也在暗中加强了对赵乃禾的观察，搜集他的材料，误以为赵乃禾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幸亏“八·一五”日本人垮了台，祖国光复了。赵乃禾才算免遭毒手。

十姊妹在放送话剧团中

哈尔滨中央放送局有一个放送话剧团，专门演广播剧。剧团中有那么一些人，由于思想倾向相近，艺术趣味相投，个人感情相亲，他们在演剧活动中互相照应，每个人又比较纯朴，于是就以年龄为序称为十姊妹。说是十姊妹，但是，并非全是女

性，而是有男有女；同时十姊妹并非10人而是13人。他们是1. 尘沙；2. 傅澄；3. 曹雷；4. 白鸢；5. 白浪；6. 苏秀；7. 侯爵；8. 石笛；9. 张扬；10. 乐然；11. 陆园；12. 风眠；13. 韩梅。这些人中老大和老疙瘩年龄相差近20岁，每个人的阅历、修养各不相同。十姊妹的说法一传出，立即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他们的行动受到跟踪与追查，暗中有人调查他们有什么背景，同什么人发生联系，有什么反满抗日的活动等等，于是一种恐怖的气氛笼罩在头上，十姊妹都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抑，但是他们的活动照常进行。他们所在的放送话剧团喊出了一个口号，叫做“为艺术而艺术”。他们只演艺术性强的话剧，不演下流荒诞的剧和政治性强的所谓国策剧。用艺术至上来抵御来自日本人的干涉，也可以用艺术性不强作为理由来拒绝演某些剧本，以艺术性强为理由来演所要演的剧本。有一次他们演曹禺的剧本《日出》，日本人把尘沙叫去，问他为什么要演这个剧本，尘沙说这个剧本有艺术性，人们愿意听，愿意看，别的剧本，没有人听、看。日本人没有更多的说话，就强迫尘沙说明剧本所写的是1935年以前的事，一定要在演出前向观众声明。尘沙答应下来，在演出前，让一个小青年到台前只说了一句话：“剧中说的是1935年以前的事”，然后照常演出。他们要演《晦明风雨》，就说剧本艺术性高。这个剧本内容是良家被突然闯进来的坏人搞得家破人亡。老百姓一看，不必多说，剧本的意义就清清楚楚了。

放送话剧团早在哈尔滨放送局时期，1935年下半年就成立了。那时，放送话剧团的成员很少，有孔繁绪、任白鸥、盛暑震等6人。演出小型广播剧，强调声音化妆，一个演员在广播剧中要担任两个或者三个角色。放送话剧团的出现，是日本人包揽全部“满语”（汉语）广播，广播节目奇腔怪调，怪里怪气，

既不像汉语，又不像外语，几乎没有几个人听，使广播成为陷入死胡同的产物。日本人察觉到人们对广播不感兴趣，“机”虽设而常关，就想出来“满语”（汉语）节目由满人（中国人）来办的主意，因此出现放送话剧团。哈尔滨放送局1934年7月开始实行“全满”联网广播，哈尔滨放送局也承担制作广播剧节目的任务，通过广播专用中继线向“全满”广播。但是，1936年11月，哈尔滨放送局改日语、“满语”（汉语）、俄语三种混淆放送为单纯的日语放送，叫做第一放送。这时哈尔滨放送局取消了“满语广播”，哈尔滨放送话剧团也因此而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1940年7月哈尔滨中央放送局又重新设立了第二放送，即“满语”（汉语）广播，所以不久也建立了放送话剧团，由尘沙主持。尘沙原名叫洪徽善，因为想到一粒尘沙在敌人眼睛中也会使它难受，就把名字改了。后来尘沙讹为沉沙、陈沙，他也无从订正。他领着十姊妹，打着为艺术而艺术的招牌，演了不少广播剧、话剧，社会影响很大。日本人也感到了他们不那么顺心，像小小的尘沙磨眼一样，然而一时又没有什么办法处理他们。

1945年8月19日苏联伞兵进入哈尔滨，第二天哈尔滨驻扎了红军司令部。洪徽善把十姊妹的人立刻组织起来，两天排出了话剧《沉冤》，第三天就演出了。不几天，中共哈尔滨的党组织派孙刚黎来找他们，在哈尔滨道外东光寮会见了有关领导，把剧团正式叫做“八·一五”剧团。他们连续排演了《蜕变》、《血溅山河》等剧目，收到了很好的演出效果。后来，“八·一五”剧团改称为“塞北风剧团”，十姊妹的成员几乎全都参加了这个剧团，集体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从此，他们脱离了哈尔滨广播电台。

（摘自《哈尔滨电台史话》）

黑河放送局

曹国彦

日本侵略者为了配合其侵略战争，宣传“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满亲善，皇军必胜”等殖民主义政策，进行反苏反共宣传，干扰苏联电台，从1938年开始实行扩充广播的五年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伪满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实行了“小电力，多数局主义”，先后建立了许多小功率的放送局（即广播电台）。伪满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的扩充计划中，要求对“国境上的小城市，为了防止敌对电波的侵犯，要研究设置特殊的广播设施。”

东北解放前，伪满共有21座放送局，1938年12月20日在伪黑河省建立的黑河放送局便是其中之一。局址设在黑河街南岗，伪黑河省瑷琿县日本文职官吏宿舍附近（现黑河市第二农机修造厂处），隶属齐齐哈尔电信电话管理局。电台呼号“MTSY”，广播频率795千赫，广播形式有第一放送，即日语广播。

1940年，黑河放送局迁至黑河六道街南，迎恩路西（现黑河兴安街81号南侧，迎恩路26号北邻），筑有320余平方米砖瓦结构平房一栋。局内设放送（业务）室、技术室、总务。局长和各室主任均系日本人。黑河放送局自建立至东北解放，共6年零7个多月，局长和各室主任均先后更换过一次。前局长大村周造，后局长西村文之助，前放送（业务）室主任渡边寿，后放送室主任佐藤，前技术室主任大木，后技术室主任沼野，事务三田。放送室主任佐藤兼日语放送员。日本职员有男放送员

志田贤尚（现在日本群馬县势多郡宫城村苗个岛一一四七）、高桥，还有一名女放送员，两名男技术员（其中一名姓未本）。中国人职员有张一伟、王懋钧、王幻塵、任宝三、扬常祥，他们先后担当汉语男放送员，张秀芝为汉语女放送员，技术室值机员刘镇远、仲延信，勤杂工邹殿恭、韩立勋，修理工小郭。另外还有一名40多岁的白俄罗斯人为俄语男放送员。

1941年起，黑河放送局用日、汉（当时称满语）、俄（当时日本称露西亚语）三种语言播音，即第一放送为日语、俄语，第二放送为满（汉）语。第二放送播出频率为1 100千赫。日播出时间约11小时，以转播伪满新京（长春）中央台和日本东京中央台节目为主，每日有约30分钟的自办节目。自办节目主要是15分钟地方新闻及邀学校学生和专业剧团、业余剧团演播歌曲、话剧、京剧等文艺节目。为组织自办节目，放送局在机关、学校、街公所、剧团均有联系人。伪黑河省公署李凤山，银行行长罗青凡，街公所街长何绍先，戏院的朱佩珩、潘桂荣，协和会孙鹏翼，业余剧团的单传慧、张华、高德山均为放送局自办节目的联系人。黑河大戏院到放送局演播过《捉放曹》、《空城计》、《四郎探母》等京剧，业余剧团演播过话剧《第二夜》，流行歌曲《真善美》、《秋水伊人》、《蔷薇处处开》、《支那之夜》等节目。演播后有时给钢笔做纪念品，有时给20至40元的放送费作为报酬。

黑河放送局为扩大影响，有时还在剧场专门召开“慰问收听者大会”，日本局长讲话欢迎大家收听放送局的广播，并组织文艺节目为听户演出。

黑河放送局录用的中国人放送员、值机技术员，一般均先到伪满新京（长春）中央台学习两个月后再回黑河工作。放送员学读稿、改稿及放送局规章制度；值机员学习放送机操作技

术。张一伟、任宝三、刘镇远等都在伪满中央台学习过。伪满中央台的姚远是放送员学习的负责人。张一伟初到放送局是准职员，工作一段后，经考试达到电语学四等合格，日语步试验三等合格，晋级为乙种职员。除做日常班次的放送员工作外，还参加采访和组织文艺节目工作，召开“慰问收听者大会”时，担当日语翻译。

在苏联开始向德国侵略者反攻以后，黑河放送局收听并记录苏联的对华广播节目。

1945年8月9日早晨，伪满中央新闻广播了苏联正式向日本宣战，在满洲东部业已进军的消息，当天上午苏联飞机对黑河空袭扫射，此时，黑河放送局呈现慌乱。下午2时许，接到乘火车向北安撤退的命令。下午3点钟召集全局会议，日本人宣布命令：全局职员包括中国人，下午5点半到放送局集合去火车站，6点半发车。人要轻装，只带走放送机，其他设备、物品一律烧毁，中国人职员不准带家属。当时张一伟、张秀芝、杨常祥、仲延信、修理工小郭、勤杂工邹殿恭和国电通信社临时支援放送局的徐常绪都参加了会议。下午4点多钟散会。张一伟、杨常祥、徐常绪三人避开日本人进行商量，觉得跟日本人走非送死不可，绝不能跟他们走，但在黑河又怕被日本人发现，于是徐常绪提议，到东四嘉子他家躲避一下，这时三人便一起到回民旅店找到了徐常绪家的马车，去东四嘉子，在徐常绪家躲了一夜。放送局的其他中国人，也无一人随日本人撤走。至此，黑河放送局随日本侵略战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根据张一伟遗稿整理，摘自《黑河文史资料》第四辑）

富锦放送局

王明义

在旧社会，富锦县是江北邻县绥滨、南岸松花江下游的同江、抚远以及南邻宝清等县的粮食产品的集散地；又是上游名城哈尔滨的轻重工业产品的转售中心。因而，电灯、电话、电报、邮局、自来水等公用设置都称完备。日伪后期，富锦放送局（广播电台）又应运而生。

富锦放送局创建于1940年春季，坐落在原富锦西南门外300米之路东（即现在的第三小学校址）。

富锦放送局播放功率为3000瓦，当时与佳木斯、牡丹江等地的放送局相比是较强的。波段为中波1230千周，呼号为MTOY。它与富锦电报电话局同属日满合办的掌握东北四省通讯命运的“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株式会社”即股份有限公司），社址在原新京大同广场（即现在的人民广场）西侧。该公司股份日本人占有51%， “满洲”占有49%。

东北四省日伪时期计有电台新京、吉林、安东、延吉、哈尔滨、佳木斯、富锦、奉天、大连、营口、四平、齐齐哈尔、北安、黑河、牡丹江、海拉尔、锦州等17座，后增至21座。这些地方电台统归设在长春的“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所属的“放送总局”管辖。

富锦放送局为华语转播台，其设备情况为：

柜式播音机两台，操纵台一座，能接收长波、中波，短波播音的八电子管大型收音机4台。

播音室的四壁、天棚、地板均用草垫（塔塔密）敷贴；天棚、四壁用黑色大绒贴面，地板草垫上铺绿色长麻绒。播音室内除桌椅、送话器、电唱机外，有五组多功能风琴一架，装有流行歌曲、京剧、大鼓、世界名曲等一千多枚唱片的柜子一座。

富锦放送局的从业人员编制恒数为局长1人，业务主任1人，播音员3人，技术主任1人，技术员4人，杂役1人；下属放送普及所从业人员4人，放送监听官1人。这些人员中，除播音员3人，杂役1人，放送普及所4人为华人外，其余均系日本人。

第一任局长由富锦电报电话局长（姓名记不清了）兼任，第二任局长叫河村，第三任局长油谷荣。先后任业务主任的有中林和大津，技术主任是和田等人。

播音员当时称放送员（日本人叫“阿纳温萨”）。创建初期的播音员有放送总局一位姓曹的，加上张万春、张绍先共3人。1940年春，开始播音后，姓曹的就回放送总局。1940年秋在富锦本地招考播音员，王明义被录取，张万春、张绍先转去长春。又调来一位叫韩云瑞的。1943年韩云瑞去职又招收了陈世宝、刘庆云2人。1940年陈世宝应征当国兵，又招收了陈宝书，直至光复。

放送普及所的从业人员有赵宝峰，赵常利、杨××等4人，该所业务范围是收收听费，推销收音机，维修收音机等。

1940年春，富锦放送局创建后，即开始转播“新京放送局”的华语广播节目，每天转播时间3次。第一次播音时间为5点—8点30分。节目内容为开始曲、节目预报、天气预报、广播体操（当时称建国体操）、音乐节目等。第二次播音时间为11点—13点30分。节目内容为新闻、音乐等。第三次播音时间为17点—21点30分。节目内容为曲艺、新闻、音乐、歌曲、

广播剧、时事述评、评书连播及天气预报、节目预报、终了曲等。其中开始曲、节目预报、天气预报、终了曲均由富锦放送局播音员演播。

每天的第三次播音，有时也穿插一些富锦地方节目，如京剧、歌曲、音乐等。参加演出的儿童歌曲节目，一般都是邀请各小学老师组织学生演出；流行歌曲则邀请中小学男女老师演出；京剧由“富锦京剧团”定期演出；音乐节目由“北辰音乐会”演播。

富锦放送局每年4月末均组织一次“儿童放送大会”。大会邀请城内各小学学生集中在富锦大戏院演出歌曲、音乐等节目，小学生停课一天参加这个活动。

富锦放送局本为华语转播台，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每天中午与午后均转播日语新闻节目。

每天午后2时，通过短波，由放送总局宣布节目内容，富锦放送局值班播音员抄收，再结合本局要穿插的节目内容编排，经局长审阅，再刻钢板印刷发送给放送监听官，各机关、学校。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仅有的两个播音组织“富锦京剧团”和“北辰音乐会”。

富锦京剧团是个业余文艺团体，负责人是王敬在，人们都称他为王翻译。他的妻子、女儿还有其他京剧爱好者一起组成京剧团，除到电台播音外，其他活动不详。

北辰音乐会为王明义发起组建的业余团体。其成员有王兆禹、刘庆国、赵俊生等人，以演奏乐器为主。后又吸收王国兰、郝淑贞、孙淑媛等人，也播送歌曲和广播剧。“北辰”取北极星的象征义，即根据孔子语录“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的中心意思命名。因而日本宪兵队和县特务股对这些人十分注意。后来，在兴农合作社工作的曾当过宪兵队宪补的周文辅也打进这个音

乐会。他们认为“北辰”是倾向北方——苏联。其实当时没有这个意思。以后才知道，当时所以能引起特务们的注意，就是因为王明义在1940年当小学教员时向学生讲过：“你们是中国人，不是满洲人。”从此，王已被特务列入要视察人的名单里。

1945年5月9日，希特勒战败，富锦地区日军也全面撤离。这时，富锦放送局也奉命将原有的高功率播音机拆运长春，换了一个功率为10千瓦的小型播音机。这部播音机仅有现在的双缸洗衣机大小，一个人可以背得起来。1945年8月7日，富锦放送局即停止播音，放送局人员均集中到富锦正大街的电报电话局。8月8日，日本人都撤到富锦南岗的军队工事里。8月9日晨苏军江上战舰轰击富锦城，12日，富锦光复，放送局结束。

（摘自《富锦文史资料》）

秦 素

尔泰 丛林

秦素是哈尔滨广播电台早期的播音员。1929年播音员李淑玲转到东北无线电收发处，就由秦素来接替。

秦素原名秦宽华（又名仲睿），河北省遵化县人，1929年时24岁。她身型健美，思想开通，性格直爽，为人刚强能干。她出身富家，为了与封建婚姻抗争，为了自由，只身来到哈尔滨。秦素善于交际，她与第三国际的人有过接触，同进步作家打过交道，同中东铁路局的上层人物（如李绍庚督办、俄国人等）有交往，关系很熟。秦素会俄语，业余时间还去念夜课，学习法学（预科）。她声音柔润、甜美，口才好，善演讲，并且是法大

业余剧团的出色演员。

广播电台是一个消息汇总的地方，也是联结上层与下层的纽带。这样的环境使秦素逐渐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广播工作，应该是为民族、为国家的振兴而呐喊的一个岗位；自己是民众信得过的消息传播者，生活的干预人，同时也是经常使人快乐的好朋友。所以，秦素觉得从事广播工作使自己精神充实。这位活泼、爽快的女子，有她特有的夙愿和抱负。秦素和苑崇古一段壮烈、动人的故事即是一例：“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11月4日，日本步兵第十六联队长滨本喜三郎率两个大队步兵和一个大队野炮兵，由日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亲自参加指挥，向驻守在嫩江桥的马占山所属的军队进攻。这里的部队并不是马占山的本部，因为他新任黑龙江军事总指挥，他的人马仍在黑河一带。这里的部队原是1928年10月按张学良的命令筹备起来的索伦山屯垦区的部队，有苑团、张团、赵团三个混成团，共7000多人。这些士兵训练有素，士气高昂，英勇善战。前线指挥是一位英俊的军官，他叫苑崇古。苑颇有爱国热情和军事指挥才能。这次战斗一打响，全体将士奋勇杀敌，日军受到沉重的打击后，又迅速增援四个大队的步兵和五个中队的炮兵，但仍无济于事。结果日军死亡180多人，伤996人，另外还死伤伪军700多人。这是“九·一八”以来，日本关东军第一次受到中国军队的真正的抵抗。这一次战役，使日本军参谋本部十分惊慌，在国际上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消息传出，中国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中共满洲省委号召下，哈尔滨市各界和学生立即组织慰问团，赴嫩江桥前线慰问抗日战士，秦素就是慰问团的组织者之一。

慰问团到了前线，送上了慰问品，秦素代表慰问团向抗日战士致意。她那一席充满爱国激情的讲演，她那发自肺腑的对

于爱国抗日英雄的崇敬感情，深深打动了全体将士的心。特别是她讲到抗日将士是中国民众的代表和希望，说得前线指挥官苑崇古心血沸腾。他上前同秦素紧紧握手，两人目光相碰，互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后秦素又对苑崇古指挥战争的情况做了采访，谈得特别投机，初遇知己的感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又加上慰问团中有一位成员是苑崇古的亲戚，他向苑崇古详细地介绍了秦素的为人，疏通了内在的感情。到慰问团离去，秦素与苑崇古分手的时候，他们约定互相联系，互相通信。

秦素回到哈尔滨，一方面利用广播宣传这次抗日战役的胜利，一方面发动民众捐献，支援抗日前线。秦素组织捐献义演时，剧场内好的坐位票价很贵，10元一张。这种票一般推销不出去，秦素拿了一把，来到上层人物中，以她的口才，晓以大义，使他们晓得买义演的票是一种爱国的行动，结果高价票销售一空。他们把募捐来的钱及时送到了前线。

11月10日，日本关东军主力多门中将的第二师团也调到了嫩江桥前线，在日军飞机狂轰滥炸，枪林弹雨之中，苑崇古指挥军队鏖战了10天，终因寡不敌众，武器相差悬殊，撤出阵地。19日撤到齐齐哈尔时，苑崇古的军队只剩下1500人，后来又转移到了海伦。此时日军侵略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哈尔滨了。而东省特区张景惠又是一个亲日分子，抗日前景黯淡，因此秦素毅然离开广播岗位而去下就一个长途电话员。实际上，秦素已经投入抗日的洪流。她利用职务之便，每天半夜，把她搜集的情报用长途电话打给在海伦的苑崇古。使苑崇古提早知道许多消息。譬如：1932年1月15日，在日本策划下，吉林“剿匪”司令于琛激率军进犯哈尔滨时，张景惠“绝对合作”的消息；1月27日李杜占领哈尔滨时，反对张景惠为欢迎日军命令全市挂日本国旗，得到人民支持的消息；以及日本大特务土肥

原贤二到哈尔滨等情况。

1932年2月5日，哈尔滨陷落，秦素无法容身，就潜离哈尔滨到海伦投奔苑崇古。抗日的共同理想和并肩战斗的情谊使他们的感情发生了飞跃。在海伦吉顺丝坊，秦素与苑崇古结为夫妻。后来，日军北进，马占山的黑龙江省政府和黑龙江军事总指挥部在海伦站不住了。一次激烈的战役，苑崇古的队伍伤亡惨重，终于抵敌不住被打散了，苑崇古怀着为国殉难的决心，还是坚持，在此紧要关头，是秦素掩护着救出了苑崇古。面临祖国山河残破，秦素和苑崇古无限悲愤。秦素出主意，利用她过去同中东铁路局的关系，凭她一口流利的俄语，可以取道苏联，绕回北京，再寻抗日的门路。苑崇古同意，他们去了苏联，由苏联绕道海参崴，经海路回到了北京。

在北京，秦素他们住在碧云寺附近的农村中。苑崇古每天出去找抗战的门路，但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使苑崇古的一切努力归于徒劳，他指望蒋介石抗战的幻想破灭了。后来，国民党给他一个空头职衔，硬把他的炽烈的抗日热情压了下去。秦素每每到碧云寺散心，看到孙中山先生停放棺槨的地方，都触景生情。她想到了孙中山先生缔造的中华民国，如今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与蹂躏，而自己联想到报国无门的现实，又生发出无限的感慨。她也曾去北京广播电台要求参加工作，然而得到的是冷冷的拒绝。正在这时候，秦素发现苑崇古潦倒并沉溺于青楼女色，玷污了她的忠贞爱情，她痛苦万般。在西山红叶随着秋风飘落之际，山河破碎的现实和爱人背高的凄楚，使她无法忍受，这位刚烈的女子，终于在碧云寺中触碑而死。鲜血染红了碑石，红叶掩盖了她的尸体。

还有一说，秦素死在碧云寺附近的家中。平日秦素身穿素服，常去碧云寺，忽然数日不为人所见，房东生疑，去敲门无

人应答，遂捅破窗纸窥探，见秦素躺在床上衣着整洁，原来已服毒自杀死去数日。

（摘自《哈尔滨电台史话》）

日本帝国主义 对伪满新闻报业的垄断

郭 君 陈 潮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侵略，历来使用两手政策，一方面使用“剑与火”的政策，进行领土占领、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另一方面利用思想文化领域，从精神上奴役东北人民，摧残其民族意识，使其忘记祖国，甘当侵略者的顺民。

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诸部门中，侵略者把新闻报纸作为其侵略的开路先锋，是侵略的喉舌，是言论机关。在侵略者看来，在侵占的地方创办报纸，至少有三个功能：一、他们创办日文报纸，组织遍布各地的记者网，从各个角落搜集情报，以供其政府制定侵略政策使用；二、利用报纸向本国人民宣传东北的富饶，引诱本国人民来东北开拓经营；三、他们创办中文报纸，利用报纸发行速度快，覆盖面广的特点，最大限度地鼓吹其侵略政策，用以麻醉中国人民，掩盖其侵略野心。正因如此，日本在中国东北创设新闻机构，创办报纸，完全是有计划，有步骤，由国家来投资的。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办报的情况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创办报纸，早在本世纪初就开始

了。日本在东北最早的报纸，是营口的《营口新闻》，创刊于日俄战前，日俄战争时休刊。从日俄战后到本世纪20年代，日本人在东北创办的报纸大体如下：

在大连的第一家报纸是末永纯一郎主持的《辽东新报》，创刊于1905年10月25日。其次是1907年11月3日创刊的《满洲日日新闻》，这两报都是日文。1908年10月18日金子平吉创办的汉文报纸《泰东日报》，这是一家颇有影响，出版时间很长的大报。1908年11月，满铁社员滨村善吉，以满铁为后援，创办英文《满洲每日新闻》，是向欧美人进行宣传的工具。此后，1917年12月创刊了《大连经济日报》，以攫取东北经济情报为其宗旨。1919年《关东报》（中文）创刊，1920年日文《大连新闻》创刊，1922年汉文《满洲报》创刊，它原为1922年《满洲日日新闻》汉文版。

在沈阳，最早的一家日本人办的报纸是中岛真雄创办的汉文《盛京时报》，创刊于1906年10月18日，终刊于1944年9月14日，历时38年，当时是沈阳有报史以来，经历时间最长的一家报纸。此外还有1907年7月1日创刊的日文报纸《奉天每日新闻》、1912年9月创刊的《大陆日日新闻》，1921年9月1日创刊的日文《奉天日日新闻》和1924年7月24日创刊的日文《奉天新闻》。

此间，在辽宁地区的日文报纸还有安东的《安东新报》（1906年10月17日创刊），营口的《营口新报》（1908年2月11日创刊），辽阳的《辽鞍每日新闻》（1908年3月10日创刊），铁岭的《铁岭日报》（1911年7月21日创刊），开原的《开原新报》（1918年3月29日创刊），抚顺的《抚顺新报》（1921年2月24日创刊），本溪的《安奉每日新闻》（1926年8月25日创刊）。

在长春，有1909年1月1日创刊的日文报纸《北满日报》，

1914年12月创刊的《长春商业时报》，1920年12月15日创刊的《长春实业新闻》，1920年4月20日创刊的《长春日日新闻》。在吉林有1922年6月1日创刊的日文报纸《吉林新报》。在延边，1924年12月24日创刊日文报纸《间岛新报》。在哈尔滨，1922年10月1日创刊汉文报纸《大北新报》是《盛京时报》的哈尔滨版。同年11月1日，创刊了日文《哈尔滨日日新闻》。

到1927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创办的报纸已有70种之多，其中日文报纸以《辽东新报》、《满洲日日新闻》为首，后来这两家报纸合并，又兼并了《大连新闻》，以《满洲日日新闻》的号头出刊，成为一个拥有75万元资金的报纸公司了。汉文报纸影响最大的是《盛京时报》和《泰东日报》。就各报的发行量来看，以1921年为例，《辽东新报》日销量为37 000余份，《盛京时报》销量为25 000余份，《泰东日报》为8 700余份，《满洲日日新闻》为25 800余份，几乎全部占领了东北地区的新闻阵地。

在这一时期，日本国内的通信社也纷纷到中国东北来创设分社，在沈阳有“奉天电报通信社”（1922年成立）、“商业通信社”（1921年成立）；大连有“电通社”（1921年成立）、“帝国通信社”（1924年成立）、“日满通信社”（1921年成立）、“联合通信社”（1925年成立）、“商业通信社”（1924年成立）；安东有“商业通信社”（1923年成立）；开原有“商业通信社”（1924年成立）；长春有“商业通信社”（1923年成立）。这些通信分社不仅供给东北各报以新闻稿，操纵东北各报；而且，通过这些分社勾通与日本国内通信社之间的联系，加强日本国内与东北的联系，达到其侵略的目的。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伪 满洲国新闻报业的高度垄断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了全东北，之后又炮制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为了强化对东北人民的思想统治，它紧紧地抓住报纸这个言论阵地，对伪满洲国的新闻报纸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建立了完整的垄断机构，以便实行高度的集中和垄断。它首先把原东北的中国人办的报纸严格控制起来，进一步再把它消灭掉。“事变”第二天，日军军队就占据了《东三省民报》、《新民晚报》等报馆。用“绑票”的办法，将各报主持人挟持到“满铁”的一个小楼里，恫吓各报今后不许发表反日言论和东北实况，否则将予取缔。1923年11月，伪满公布了所谓《出版法》，规定东北地区的报纸、杂志的出版，要取得他们的认可，并限令东北各报社的记者、职工要登记造册，呈报立案，把东北各地中国人办的报纸及编辑人员，控制在他们的手中。

为控制中国人办的通信社、报社，日本又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通信社”的政策，于1932年12月1日，成立了“满洲国通信社”简称“国通”，通过它来垄断东北的新闻通讯机构与事业。“国通”的任务是采集、编辑、发行新闻稿，为伪满境内汉、日、英、俄、朝鲜等各种文字的报纸及无线电台提供新闻，并强迫尚未停刊的几家中国人办的报纸，使用其新闻稿，甚至还强行命令某条新闻必须登载，某条新闻要用什么标题，登在什么地方，都有严格的规定。为严格控制伪满的新闻事业，实行所谓“日满通讯网一元化”，1937年4月，与日本“同盟社”订立了契约关系，主要内容是：1. “国通”派驻日本和中国（指关内）的通讯员，皆入籍于“同盟”，“同盟”派驻伪满的通讯

员，皆加入“国通”；2. 缔约前，“国通”在日本东京、大阪的支社，和“同盟”在伪满各地的支局，相互移让；3. “国通”从伪满发送消息到日本和外国时，用“同盟”的名义，“同盟”从外国和日本发送消息到伪满时，用“国通”的名义，实行“新闻交流”。“通讯一元化”的结果，使“国通”变为“同盟”的一个支社。

“国通”还极力扩大通讯网，在东北各地增设支局，到1940年，它已有6个支社、24个支局、3个通信部和9个通商部，通过这些支社、局，采集伪满境内的新闻。又通过“同盟社”的关系，利用其海外通讯网和与“同盟社”联盟的外国通讯社，如英国的路透社、美国的联合社、合众社、法国的哈瓦斯社、德国的德意志社、意大利的斯泰劳尼社、苏联的塔斯社等的联系，形成国际通讯网，发送国际新闻。新闻稿，每日发送2至4次，用汉、日、英、俄四种文字，供给各地报社和伪官厅、军宪机关、伪公共机关、银行公司等使用。

为进一步控制伪满洲国的新闻通讯事业，伪政府于1936年4月7日发布“满洲弘报协会组织章程”，9月2日“满洲弘报协会”成立。弘报协会是伪满国务院弘报处的一个隶属机构。弘报处是伪满最高的宣传机关和情报机关，它下面设立许多组织如“满洲映画协会”、“满洲放送协会”、“满洲观光联盟”、“满洲弘报协会”等，分管电影、广播、旅游、新闻各部门。伪满弘报协会是一个完全由日本人操纵的官方组织，它是兼营通讯社和报纸的托拉斯，是垄断为满洲国新闻通讯的“新闻王国”，它把伪满洲国的新闻报道、言论和经营三方面统一起来，实行严格的官制统制。

“满洲弘报协会”不仅政治上有靠山，又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它成立时有资金200万元，到1940年已拥有资金800万元。它

的资金来源有二：一是伪满政府拨给；二是“满铁会社”、“满洲电业会社”资助。

弘报协会推行“一地一报”的方针，对伪满各地报社进行兼并和“整理”。首先被合并的“满洲国通讯社”，后来由于“业务不便”，不到一年又分离出来，但仍隶属于弘报协会。初期被兼并的有8家报社：日文报社有《满洲日日新闻》、《奉天日日新闻》、《哈尔滨日日新闻》、《满洲新闻》4家；汉文报社有《盛京时报》、《大同报》2家；朝鲜文报社《满鲜日报》；英文报社《满洲每日新闻》等。以后又陆续吞并和收买，到1940年末，已经有19个“加盟社”了。除上述8个报社外，还有“齐齐哈尔新闻社”、“安东新闻社”、“间岛新闻社”（以上是日文）、“泰东日报社”、“大北新报社”、“安东时报社”、“黑龙江民报社”、“三江报社”、“延边晨报社”、“热河新报社”（以上是汉文）、“哈尔滨时报社”（俄文）。这些“加盟社”在业务上和资金上，都受弘报协会的控制。对于不宜兼并的报社，就进行整理合并。1937年8月，它把奉天《大亚公报》、《民报》、《奉天公报》、《民声晚报》、《奉天日报》合并于《盛京时报》。同年10月，把大连的《满洲报》、《关东报》并入《泰东日报》，把长春的《满洲商工日报》并入《满洲新闻》。此外，在哈尔滨、牡丹江、延吉、齐齐哈尔、佳木斯、安东、承德等地，用这种“大报吃小报”的办法，被“整理”的还有14家，当时东北共有40余家报社，属于弘报协会的竟占3/4，其发行量占全“满”报纸发行总量的85%，剩下几家“非加盟社”，其力量微乎其微，根本无力与“加盟社”抗衡，只是因为不问政治，只登社会新闻，才得以苟延残喘，如奉天的《醒时报》便是如此。通过兼并和“整理”，整个伪满洲国的新闻通讯，便全部控制在弘报协会的手中。

伪满“弘报协会”在兼并“整理”其他报社的同时，又极

方加强其内部的业务建设。首先是修建弘报会馆，它是“弘报协会”和“国通”的名义，投资50万元（伪币）修成，1937年10月动工，次年11月竣事。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地址在伪新京中央大街儿玉公园（今长春市胜利公园）前。这是“弘报协会”和“国通”的办公楼，一些外国驻新京的支社，也驻在这里，成为伪满洲国的新闻中枢。其次就是培养一批忠于协会的记者。首先是提高报社人员的待遇。弘报协会的报社网建立以后，实行各报社记者报酬统一的制度，各报社的记者，不论内勤、外勤，不论大报、小报，不论边陲地带或城市，在同等级者，其报酬大致相等，用以刺激记者工作的“积极性”。其次，实行记者交流制度，在一定期间内，各报社可以互调记者，使记者熟悉各种报纸的业务，以提高其“素质”。第三是建立专用电话线和电传照像设备。弘报协会利用“电电会社”是其股东这一条件，很快完成了安东奉天间的日、朝鲜、“满”的直通电话，后又完成了大连、奉天、新京、哈尔滨的直通电话线路。“电电”又根据“国通”的要求，于1937年夏，完成了奉天——大阪间电传照像业务，之后又完成了新京——东京间的电传照像业务，同时在伪满洲国内地，特别是偏僻地区也实行了电传照像。这样，新闻稿可以用电话直接发向报社，提高了新闻传播的速度，而新闻照片的传播又较大地增强了伪满报纸的宣传能力。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日趋紧张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即1941年8月25日，伪满政府发布“满洲国通讯社法”、“新闻社法”和“记者法”，建立所谓“新闻新体制”。这个新体制的方针是：

1. 在文化发达的城市，内容重复的报刊要停刊；2. 在偏远的地方，即所谓“政策实行不彻底”的地方，要创办新的“满

文”报纸；3.“国”内现有报纸，要积极报道伪满洲国情，以使“与国际关系相适应”。

根据上述三个法令，对伪满洲国通信社进行了改组，在1941年12月21日撤销了弘报协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加强新闻的管制，建立起三个大新闻社。即“康德新闻社”，用汉文出版，统管汉文报纸，合并了18家报社；“满洲日日新闻社”，用日文出版，兼并了3家报社；“满洲新闻社”，用日文出版，合并了6家报社，统管日文报纸。随着战局的发展，1944年5月，《满洲新闻》和《满洲日日新闻》又合并为《满洲日报》。

日伪报纸内容剖析

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的伪满洲国新闻报纸，其宣传内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鼓吹日本侵华战争的“合理性”，宣传“大东亚圣战”、“日满一德一心”，污蔑中国人民的反日斗争，宣扬侵华战争的“辉煌战果”，甚至是制造谣言，用以欺骗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但由于汉文和日文报纸的地位和读者对象不同，其内容上又有很大的区别。这里以汉文的《大同报》和日文的《满洲日日新闻》为代表，加以分析和揭露。

《大同报》是伪满洲国政府的机关报，1932年3月15日创刊。这家报纸完全仰仗着日本侵略者的鼻息行事，奉承侵略者的意志，读者多数是生活在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所以，它是典型的“奴隶型”报纸。《大同报》每日发早、晚两刊，每日对开3大张，共12版，有“重要新闻”、“专文”、“本市新闻”、“社会新闻”、“经济新闻”、“社评”、“副刊”、“广告”等栏目。

《满洲日日新闻》是日本侵略东北最古老的报纸，也是一家势力最大的日文报纸。它的读者群是在东北负有侵略使命的日本人，包括上至操纵伪政权的日本军政人员，中至掠夺东北财

富的富商大贾，下至无恶不作的流氓浪人，是“奴主型”的报纸。

“社评”（即社论）是报纸的灵魂，它代表政府对当前形势或重大事件发表指导性言论。“杂评”是对一些具体事物发表具体意见的场所。《大同报》由于其奴隶地位，它不敢对形势或重大事件发表言论，很少有“社评”，偶尔有一篇“社评”，也都是无关紧要的内容，诸如“严防偷窃”、“种痘与防疫”、“医师不足与保健”、“妇女职业与道德关系”等。至于“杂评”，则根本没有。《满洲日日新闻》则不同，它每日必有一篇“社评”，各版都有“杂评”，有对一般时事和国际情况的杂评，有对伪满经济的杂评，有对社会问题的杂评等，它站在侵略者或者是统治者的立场，用“社评”、“杂评”来指导形势，或者纠正统治者当局的某些错误。如1940年4、5月间，它出了这样的社评：“急谋根本的对策——油房休业与专管制度”、“贸联推进的目标——认清重大使命”、“物资困难与生活方式的根本改革”等，这些社评不是一般地歌功颂德，而是面对着日本在伪满的实际，发表的“积极”意见。它既暴露了日本对东北的榨取所遇到的困难，又为它出谋划策。“杂评”也是如此，如“关于开拓政策的进展”、“在满纺织业的危机打开的观察”、“抑止物价的昂腾”等。

从“新闻”和“专文”这两个栏目，也可看出《大同报》和《满洲日日新闻》的不同。“新闻”是最新或最近发生的事情，是报纸言论的主要成份，也是形成舆论的主要原料。日本侵略者用捏造的新闻来无事生非，造谣中伤，制造舆论。《大同报》的“重要新闻”栏目，一般只刊登政令新闻，什么“价格并配给统制法”、“强化暴利取缔令”等，强迫东北人民必须遵行。再就是宣传日本侵华的“战果”和对我抗日部队的诬蔑。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打得如火如荼的欧洲战场，即欧战新闻，却很少报

道。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不愿让东北人民知道欧洲战场的情况和日本在欧洲战场上所处的不利地位。在“一般新闻”和“社会新闻”栏目中，也只登些恋爱、情杀、桃色新闻，再就是什么“满日亲善佳话”等一类麻醉人民的“新闻”。《满洲日日新闻》则不同，它积极报道国际新闻，如欧战情况、外交活动、欧洲特派员的通信。它重视日本国内的新闻，如政治改革、经济难关等。它也报道中日战争的“战果”和对我国抗日战争的谣言，但这类新闻不算太多。它很少报道伪满洲国的政令新闻，对伪满的经济情况，偶而也有比较真实的报道，如“失业满人卧轨自杀——王福仁被制麻会社解雇”、“买价过高公定价过低——屠户铺老板的悲鸣”、“豆腐制造不出来——豆腐坊老板叹大豆的缺乏”。这些新闻暴露了在日寇铁蹄下东北经济情况，意在提醒日本当局的警惕，这和《大同报》的桃色新闻截然不同。

“专文”是指系统地评论文字系统的记叙文字。《满洲日日新闻》的专文，多记日本在东北经济榨取方面的情况，如“东边道资源概况”、“营口港的将来”、“扎赉诺尔油田”、“满洲经济政策的重点转换”、“新贸易机构的经纬及其将来”等文章。再就是关于国际形势的专文，如“苏联的近东政策与土耳其民族”、“欧洲大战对中国事变的影响”等。而《大同报》的专文，则是什么“法院旁听记”、“国军视察记”、“日满关系愈加紧密”等无关紧要的文字。

从副刊上也反映了这两家报纸地位的不同，《满洲日日新闻》不太重视副刊，只有“家庭”、“文艺”等栏目，刊登一些家庭享受、小说、随笔之类的文字；而《大同报》的副刊，名目繁多，“消闲”、“电影”、“学生”、“家庭”、“文艺”等栏目，多登一些毒汁四溢的消闲文字，或登一些“废物怎样利用”、“火柴的经济使用方法”等。在“文艺”副刊中，偶而也能见到

反映铁蹄下的东北同胞悲惨生活的文章。

再值得一提的是《盛京时报》，它和《大同报》一样都是伪满时期销行全东北的头号大报，在它的极盛时期，日出3大张半，14个版面，发行量达18万份。该报仰仗帝国主义特权，针对中国时政，放言高论、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唯恐中国不乱。“九·一八”事变以后，该报更加得天独厚地称雄于沈阳，版面不断扩大，销量增加，及至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更加骄横一时，睥睨一切，在沈阳乃至全东北呈现大一统的局面。它的新闻稿很短，一般为一二百至五六百字，外市县新闻在百八十字上下，但桃色新闻、凶杀案、演员生涯等却添枝加叶，篇幅较长。其副刊除综合性的“神皋杂俎”外，还有“家庭”、“青年”、“儿童”、“妇女”、“文学”等栏目，一般都内容贫乏，文字水平亦差。“文学”副刊自1940年后，曾间或发表一些带有进步倾向的作品，这是东北进步作家，利用敌人阵地发表的言论，是日本侵略者意料不及的。随着日本在侵华战场上的失利，到1944年9月15日，《盛京时报》改为《康德新闻》奉天版，结束了它38年的历史。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伪满洲国随之垮台，《康德新闻》同其他在日本操纵下的伪满洲国报纸也都“寿终正寝”了。

综上所述，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伪满新闻报纸，表现了十足的殖民地性质，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号角和工具，是日本侵华的文化尖兵。

（摘自《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1辑）

被囚禁的新闻

林 穆

在东北地区，新闻事业也有过几十年的兴衰史，其间还有过一个时期的畸形变化，那就是伪满时期对于报纸的三度统治（日本人叫做“统制”）。由于报纸是反映民意的有力武器，日伪当局畏之如虎，千方百计加以控制，力谋使之就范，一律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于是，他们根据愈来愈紧张的局势变化，挥动政权大斧，随心所欲地削改新闻机构，除了统一报面所有的言论、消息外，就连版式、语言，甚至报社的组织也都按照日本方式改变。对于那些不放心的报纸，不论是中文报、日文报，也不论其规模或影响大小，一声令下统统砍掉。如此统来统去，最后终至统成了一家之言，使报纸完全失去了反映民意的性格，这就是伪满时期统治新闻的特殊现象。笔者曾在伪满新闻界工作十多年，现在就所能回忆起来的当时情况，分段做个介绍。

“九·一八”事变前的概况

历时最久发行量最大，而且在伪满最有潜在势力的，是《盛京时报》，这家报纸有38年历史，是日本战败沙俄后企图侵略中国的一支文化尖兵。表面上它是受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支援，暗中据说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第四课有密切联系。这个报社的社址设在日本租界内（即今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大街北头），社长先是中岛直雄，后为染谷保藏，主笔是菊池贞二。编辑局长（即总编辑）先为大石智郎，后为酒家重好。编辑人员

有一部分是日本人，多数都出身于日本为侵华而设于上海、专教汉文的“大同书院”。这些人一般都能撰写中文、编辑报刊，采用的华人编辑，有穆儒丐、王冷佛、金小天等当代的知名文士。蔡池贞二化名“傲霜庵”专门撰写中文社论（由华人学究李克庭修词）。由于他们是外国人，拥有治外法权，敢于触及满清政府及军阀政权的时弊，意在起离间作用，迷惑了不少读者。当时有些报纸，尤其是《东三省民报》及其附属的小报《新民晚报》（社址在大南城门里文庙旁）洞烛其奸，同他们公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两下里常作笔战互相诟谯。当然，广大读者还是拥护本国的报纸，所以《新民晚报》洛阳纸贵风行一时。主编者林霁融化名“胡治博士”，常写一些讽刺小品，最受读者欢迎。

伪满初期的新闻统治

“九·一八”一夜炮响，日本军首先占据了沈阳城，《东三省民报》还坚持出版了许多天。记得那时该报社论公开提出的口号是“沉着、冷静、不屈服”，如此挺身抗争，确是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气节。不过，所谓“沉着、冷静”，幻想依靠谈判来解决问题，也反映着导致失败的不抵抗主义。不久，日本人便下手统治新闻，多数报纸被迫停刊了，只有回民的《醒时报》被留下来，大概是为了笼络回族。当然，这时的《盛京时报》不仅保留，而且越发活跃起来。他们为了把势力伸张到北满，又在哈尔滨建立了《大北新报》，委派其编辑局长（即总编辑）大石智郎出任社长，成为《盛京时报》派生的子报。后来，著名的大汉奸赵欣伯，通过日本的特许，私人占据了沈阳的《东三省民报》，改出《民报》，并继续出版原有的周刊《沈水画报》，委派他的亲信魏诚斋任社长，日人工藤旨浩任编辑部长。另外，

经日本人批准，又新出现了几家报纸，如《大亚公报》（社长王光烈、总编辑于莲客）；《奉天公报》（负责人忘记）；《奉天日报》（主编杨鸿影）；《晶画报》（主编赵任情）等。自然了，此后各报的政治言论，都要按照日本的定调来歌唱，尤其对政治版的消息来源，伪政权控制极严，只许采用伪“满洲国通信社”稿，别无其他路径。而所谓“国通社”的消息，又都是来自日本的“共同社”、“同盟社”，所以原稿一律是日文，必需要经过翻译才能登载，因而报社特设了翻译部，不言而喻，消息的内容都是鼓吹日本侵略政策的。尽管如此，还常有内令禁止发表某些需忌避的消息，在报纸出版之前，伪警察局还要进行严格审查，如果送审的大样（付印前的整版样）不被盖上“检阅济”（即审阅完毕）的图章，报纸便不能浇版付印。有时盖章以后打成纸型，又临时通知撤销某篇文章，报社不得不在纸型上“开天窗”（挖纸型）或刮铅版，对于消息的封锁，力求风雨不透。

尽管如此严密，中国人心毕竟是他们无法统治的，某些有心人，有时仍能乘其间隙，给他们掏胸一拳。据我回忆，就有过这样的趣闻：

1935年，日本政府摆布当了伪皇帝的溥仪访日，去会见他们的天皇裕仁。当然，他们要大肆开动宣传机器，让报纸隆重宣扬这场傀儡戏。《盛京时报》不但列为头版头条，而且加上最醒目的标题“二圣交欢”。本来这“交欢”二字属于日本用语（当时中文报生搬硬套日本语言的病态很严重），在中文里容易产生歧义，偏偏他们所写的“欢”字，又是平时罕用的“驩”。稿子发到排印工厂，被一位有心的工人看出是可乘之机，就在临付印时，煌煌大标题“二圣交驩”竟然变成了“二圣交驢（驴）”这个字不但闯过了警察局检阅的眼睛，而且传到读者的

手中，这当然是犯了所谓“大不敬罪”。日本宪兵队发现之后，暴跳如雷，百般追查，有一位新来的徒工，勇敢地出面掩护，承认是自己识字水平太低，拣字时错把“驢”字拣成了“驢”，弄得宪兵队也无可奈何。

那时除执报界牛耳的《盛京时报》外，其他报纸的发行量都不甚大，有的只印一两千份甚至几百份，显然，销数如此低微，很难招揽广告，其收入远远不足以维持存在。所以有的报社人员极少，名义上叫做新闻机构，实际只有三五个人支撑架子，而且经常不能开资。他们并不是乐于苦撑，其办报的目的，是为了捞取一点政治资本或招摇撞骗的邪恶势力。如赵欣伯是为了扩张他的汉奸地位，有的人则是利用记者资格在社会上钻营勒索，有些地痞甘愿花钱挖弄，办成一个外县的某报分社，就可以蘸些竹杠而自肥，有无工资是在所不计的。因此，有的报纸为了敷衍出版，自己不编，专去剽窃他报的成品，看都不看，就整版搬用，有时连别家报社的声明稿也给搬上了。倒不是说所有的报社一概如此，如《大亚公报》、《醒时报》等的作风还是比较正规的。

“七·七”事变后的新闻统治

日本人侵占了东北后，也把他们的派系斗争带到了这些地方。日本的一个财阀西片朝三，一心想借新闻事业在东北发展其私人势力，首先在大连创办了《满洲报》，聘得名士金念曾担当主笔，出版日刊两大张，气派很大。并且他们为取悦中国读者，在战争时期敢于发表日本军失利的消息，例如公然登载过“金泽师团全灭”等的报道。因而这家报纸影响较大，发行量仅次于《盛京时报》。西片曾对金念曾说过这样的话：“有朝一日，咱俩同去坐牢。”

西片朝三不是志在旅大一地，是想以他个人的力量在东北新闻界树立权威。他在大连取得初步胜利之后，便开始向北发展，于1935年又在沈阳大西街创办了日刊一大张的《民声晚报》，委马星垣任经理，先委韩董洲后委张达任编辑长。网罗的编辑人员，绝大部分都是富有学生气质的青年，版面上也就相应出现了一些朝气，因而刊行不久就很引起读者的重视。然而，这种私人势力的膨胀，难免与《盛京时报》等官派形成对立，特别是报纸的内容，老气横秋的“盛京”往往不是青春气盛的“民声”的对手。尤其是在“七·七”事变爆发时，各报纷出号外，抢先出版，展开了报道最新消息的竞争。伪满的报纸编辑工作，夜班只做到10点钟左右，《民声晚报》这时却打破惯例，编辑人员通宵不寐坐待伪“国通社”的最后电讯，天一亮便把最新消息的号外散布全市，因而《盛京时报》的消息常常是瞠乎其左。这一来，两家报纸的矛盾更激化了。有一次伪“国通社”一时疏忽，发出了中国政府《告全国人民书》全文，号召全民抗战救国，《民声晚报》立即译出发表，当警察局慌忙电令撤销时，这篇文章已经发到全市读者的手里了。

在时局日趋紧张的情况下，这类现象使日伪当局十分惶恐，于是，他们又施展“铁腕”，实行第二次的新闻统治。办法是每省只留一家报社（当时日伪把东北全境划为10个省），奉天省自然是《盛京时报》独存（日文报只留《满洲日日新闻》——现《辽宁日报》社址）。其他报纸，包括日文报《满洲新闻》都限于8月1日一律强迫停刊。侥幸的是回民的《醒时报》又被保留下来，这是念它发行量小影响不大，留下做个“配碟”。就在7月下旬，《盛京时报》发布了这条命令，将被扼杀的《民声晚报》当然不甘心，他们以取得出版权为法律根据，抗令不从，坚持继续出版到8月3日。这就惹恼了日本宪兵队长，将《民声晚

报》负责人传去，拍案大叫，宁赌纱帽也要逼迫停刊。毕竟那时法西斯强权高于法律，“民声”和“满洲”等报都不得不一齐关张，至此，西片朝三自我扩张的野心，终于成了泡影。

一果独存的《盛京时报》，从此高视阔步势力更大了，他们把《民声晚报》、《大亚公报》的部分编辑人员吸收进来，注入了一些新鲜血液，版面也逐渐活跃起来，每日出版三大张半，发行量达17万份（在当时的东北算是最多的）。另外，他们还增加了4开版的《小时报》，专门登载一些社会花絮；同时又帮助“锦州省”创建了一份《江西晨报》。

战争后期的新闻统治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军虽曾猖狂一时，不久便力竭势衰转入困境了。形势日趋严重，日伪当局唯恐人心动摇后方不稳，更想从严封锁失利的消息，于是，他们又进一步统治新闻了。尽管当时长春的《大同报》是伪满政府的机关报，而主宰统治的，仍然是实权在握的《盛京时报》。1943年首先在长春成立一个“满洲新闻协会”，统辖全东北的中日文报刊，由《盛京时报》社长染谷保藏担任理事长。继之，同年又把东北各地的中文报统统改称《康德新闻》，总社设在长春《大同报》原址，调《盛京时报》主笔菊池贞二担当理事长，穆儒丐担当理事，编辑局长酒家重好任总社编辑局长。其他各地的报社全都改为支社，如《盛京时报》改称《康德新闻》奉天版，所有各地方编辑记者，都归总社统一领导调动。这样，各地报纸不光是言论一致，组织上也划为一家，名实都成为真正的一家之言了。这种做法，即使在日本也是别开生面的，其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把报纸的喉舌掐得更紧。

伪满国务院弘报处（相当于宣传部），为了虚张声势，还在

1941年、1944年派遣报界代表参加广州和东京召开的“东亚新闻记者代表大会”，1943年在长春召开一个“东亚操觚者大会”（也同属新闻记者大会）。此外，伪弘报处还于1942年在各大城市举行一次“记者资格考试”，对合格者授予充当新闻记者的资格，实际被录用者寥寥无几。

到了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颁发诏书，宣布忍辱停战，即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康德新闻》的最后一张报，登出了头条报道：“大东亚战争停止，满洲帝国事业至此结束。”于是，《康德新闻》也就随之作了鸟兽散，再也不搞什么新闻统治了。

（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四辑）

伪满时期在长春出版发行的报纸

洪丽华

在长春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14年中，据查到的资料，曾先后出版发行过20种报纸。其中，中文报纸4种，日文报纸12种，朝鲜文报纸2种，蒙文报纸1种，英文报纸1种。

中文报纸

《大同报》

《大同报》是傀儡政权满洲国政府的机关报，是当时影响最大，日本当局控制最严的报纸。大同2年（1933年）3月1日正式发刊。康德10年（1943年）改名为《康德新闻》。社址在长春东六马路原《大东报》社址。“九·一八”事变后，由日本

关东军顾问都甲文雄主持，改组机构，更换人员，刷新版面，改用新机器、新铅字，出版朝夕刊12版《大同报》。经费由满洲国政府补助。从业人员210名。印刷厂在社址后面的平房。机械设备有马力诺尼式轮转印机2台，平板印刷机2台。康德9年（1942年）有轮转印刷机4台，平板印刷机4台。

《大同报》行销全东北。康德元年（1934年）发行1.5万份。在日本东京、大阪，中国东北大连、奉天、吉林等地都设有分社。分社遍于长春各县。分社负责人（即社长）在小县城里也算是头面人物。大的分社兼办通讯采访，写稿人也叫记者，但编制不在总社。当时发行报纸不通过邮局，而是通过分社或由专做卖报的生意人兜揽订户，雇报童送报。朝刊，必须在清晨7点钟前送到读者手中。夕刊是刊登当日新闻，要在吃饭前送到。

大同2年（1933年），社长为王光烈（王希哲，中国人，是金石和篆隶书法名家），副社长为都甲文雄，主编为山田源二，营业主任为横山八郎，发行部长为衣宝田（中国人）。这些人都是经关东军第四科严密注意和慎重挑选的。日本人认为社长王希哲作为旧《东三省公报》社长，是新闻界受难时期——张作霖、张学良时期，奉天的中国报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八·一五”光复后，王回沈盘居，后离沈去北京居住），副社长都甲文雄是个老中国通。主编山口源二笔名“海旋风”，是新闻杂志界有名的锋利而洒脱的笔杆子，是一个老中国通。他崇尚淡泊、侠气而饱经风霜。营业部主任横山八郎，以前曾任北京《顺天时报》记者，后升任东方通讯社北京分社长，被称为“锐利周到而正派的人物”。尤其是都甲和横山的中国话已经不是门外汉，同年轻的中国记者寝食起居在一起。康德5年（1938年），社长为染谷保藏，主编为大石智郎，总务兼编辑局长为汤畑正一，营

业局长为虫明猛。康德8年（1941年），社长为染谷保藏，编辑局长为岩下挥夫，营业局长为福島洁。康德9年（1942年），编辑局长为酒家重好，原为《盛京时报》编辑局长。

《大同报》社的组织机构，康德10年（1943年）设有编辑局，局长、次长各一名。局长负责编辑局全面工作。局长之下有论说委员，专门撰写社论。

编辑局内设整理部，即编辑部，每块版都有一名编辑负责。

取材部，即采访部。有中国人和日本人记者、摄影记者、漫画记者（日本人，笔名梅琳）。

文化部，名为“部”，实际只有一个人，负责主编副刊。

校对部，负责校对看样。

翻译部，主要任务是将日文稿翻译成中文稿。一是翻译国通社通讯稿；二是翻译该社日本记者采写的新闻稿。同时还负责由长春向沈阳、哈尔滨每天定时的电话通讯工作。当时中国人记者10余人，只有一两个稍通日语。

资料部，一名工作人员，藏有图书、图片和新闻资料。

营业部。

据《大同报》社的记者回忆：到《大同报》社去工作的人员不需要考试，只要有人介绍，填写一份履历表，经编辑局长谈话，认为行了，就可以上班了。上班后，先领“辞令”。“辞令”就是报社发给的任命书。上面写：“兹任命×××为大同报社职员，月薪××元，此令。社长×××（印）。年月日”。报社的工作人员有职员、雇员之分，记者是职员。记者上班后报社给办理市内电汽车全线免票和火车二等车免票使用证明。同时要交两张最近免冠照片，由报社负责，一张交送新京警察厅特务科；一张送交主管警察署特务系，登记为“要视察人”。就是说当了记者以后，就要有特务经常来“视察、观察”了。

记者采访用名片，不用记者证。采访路线由取材部部长来指定。记者出勤，不要求到报社，可以直接到采访地点。不乘公共汽车时，报社有汽车定时接送。遇有特殊采访任务，由编辑局长或取材部长指派。如采访皇帝“临幸”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式，受报社指派的记者，先得到一本封皮上盖着“绝密”章的材料。内中详细说明自皇帝出宫起，至典礼完毕止的一切行动仪式和时间。在正式典礼的前两天，还有一次“演礼”，即预演。除关东军司令官以外，其余自总理大臣以下所有参加的人员，一律到场。由一名近卫军官，手执黄旗，当做“如朕亲临”，一一行礼如仪后，演礼完毕，记者开始正式写新闻稿。新闻稿撰写晴、雨两套，分发沈阳、哈尔滨两社。正式典礼那天，通过电话说清楚天气晴或阴或雨就行了。正式典礼那天，记者必须要穿协和服，戴协和礼帽、白手套，胸前佩带协和礼带。臂上带有黄地红边，印着“新闻记者班”字样的袖标。新闻记者要在指定地点排成一列。排头是班长，是首都新京警察厅特务科长。摄影记者另有地点，服装样式和文字记者相同。对摄影记者有条规定，只许在指定地点摄影，不许走动，而且摄影机会只给一次。有一次国通社的摄影记者在帝宫前，拍皇帝出宫的照片没有拍好，又没有办法不向报社发稿，只好把往年的旧照片拿出来充数。以为只拍皇帝的车，看不见人没什么关系。不料这一年皇帝乘车车饰与往年不同，见报后被弘报处和警察厅特务科同时发现。通报下来，给予罚俸处分。还有一次《大同报》日籍摄影记者在安东（丹东）镇江山上等候给皇帝拍照。等的太久，要小解，又没有厕所。他见满山花木，绿荫丛丛，就躲到深处方便一次。谁知道并未逃出特务的监视。回报社后，大会宣布为“不敬罪”，被罚了一个月的薪俸。

伪满时对记者最好的待遇是免征“国兵”，另外有些机关，如国务院、民生部、市公署、协和会等，都设有记者俱乐部。记者俱乐部有徽章。机关里，都有弘报人员，专司发布新闻，接待记者。有些机关、团体还经常举办记者招待会。有定时和不定时的两种，内容也不一样。有的是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有的纯属于应酬交际。定时招待会如弘报处主持的火曜会，每周二中午在卜劳威大菜馆举行。中国人记者部分编辑和论说委员参加。会上讲述形势，指出下周宣传重点。主持人多为弘报处参事官庄开永。不定时招待会用于宣传的目的。如，满映拍成新影片举行招待会；演艺协会为名演员演出与各界人士、新闻记者会面的招待会；邮政总局、林野总局为开展业务举行的招待会，都属于此类。不属于宣传目的的招待会是很多的。机关、团体都有这笔经费，经常设宴与记者联欢。

《大同报》朝夕刊对开12版。1至5版为政治、军事方面的新闻版。1版刊登社论和要闻，2版刊登国内国际新闻，3版刊登吉林新闻，4、5版刊登东北各地新闻，6、7版为文艺版，刊登小说、戏剧、诗歌等，8版正页以外，刊登人物小说、风土人情、文化教育、科学历史知识等，9版为经济版，10版和12版刊登广告，11版刊登各地新闻。《大同报》是伪满洲国政府机关报，是日伪当局的舆论工具，政治、军事版都是采用“满洲国通讯社”新闻稿，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大肆宣扬“日满一德一心，谊切股肱，亲善提携”、“满洲国赖盟邦仗义援助，国运年盛一年”等等。语言极其肉麻，呈现一副奴才相。

《大同报》在组织上受伪满国务院弘报处领导，业务上受“新京首都警察厅”特高科监视与检查。日伪当局对该报的出版是严加控制的。每期报纸在付印之前，都要把大样送交“新京首都警察厅”特高科检查盖章后，才可以印刷出版。但是，他

们对《大同报》副刊的内容却不大注意检查。我地下党组织就抓住敌人这个薄弱环节，利用副刊这块阵地编发抗战作品。在日伪黑暗统治中传播革命火种。

1933年8月，哈尔滨一批革命文艺工作者，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指示，把长春出版的伪满政府机关报《大同报》副刊抓到手，利用该报副刊创办了《夜哨》文学周刊。每周为该报日刊编一期文艺专刊。《夜哨》的编辑工作由在长春的陈华负责。但每次发表哪些稿件，由在哈尔滨的文学工作者说了算，把要发的稿件寄给陈华，不足部分由陈华补充。这样《夜哨》上发表的一些小说、诗歌和独幕剧，隐晦地揭露了日伪的残酷统治，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反抗斗争。独幕剧《两个阵营的对峙》描写了一群精神病患者，借铁路员工之口愤怒地喊出：“起来，全世界的罪人！”小说《口供》揭露了甘心充当日伪统治者的爪牙，骑在人民头上做威做福的日伪警察的罪行。诗歌《从黑暗中鉴别你的路吧！》和《说什么胜似天堂》，揭露了日伪罪恶统治的本质，唤醒人民起来斗争。“凭自己的力量，凭大家伙的力量，一定能把地狱变成天堂！”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萧军、萧红和白朗，都是《夜哨》文学周刊的撰稿人。萧军以“三郎”为笔名发表的诗有：《说什么……》、《全是虚假》、《搬夫》、《哑了的三弦琴》和《一天砸碎一电灯泡的故事》；萧红以“悄吟”为笔名发表的新诗《八月天》、小说《小黑狗》、《哑老人》、《渺茫中》、《烦扰的一日》；白朗以原名刘荆发表诗《陨星落了》、小说《祇是一条路》、《叛逆的儿子》等。《叛逆的儿子》连载11期。主要内容是通过对一个背叛地主家庭的青年的描写，揭露封建地主阶级的自私、奸狡、残忍和剥削的本性，并发出“将以正义和真理”向其“逼攻”的呼号，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3年《夜哨》发表了一篇署名文光的文章《路》，讴歌抗日游击队战士，被敌人察觉而被迫停刊。《夜哨》从1933年8月6日创刊到同年12月24日停刊，共出21期。在群众中是很有影响的。

《实话报》

《实话报》是《大同报》社出版的一份小报，和《大同报》一样创刊于大同2年（1933年）3月。日刊、4开4版。主要刊登社会新闻，属于茶余酒后低级趣味的读物。《实话报》的名字是当时弘报处的事务官于晴轩给起的。《大同报》和《实话报》的工作人员是可以灵活调动的。

《盛京时报新京号外》

《盛京时报新京号外》创刊于1933年。不定期出版。发行人汤畑正一。

《康德新闻》

《康德新闻》是康德10年（1943年）7月1日由《大同报》改名而来。开始为对开4版大报，出过晨刊，晚刊，日刊。1版为要闻版，2版为综合版，3版为东北新闻，4版为文艺版。后改为小报，4开2版。宣传内容主要是日本军事力量的强大和取得的战果。《东京电》、《大本营消息》充斥整个版面。随着日本在战争中的失利，版面上的《大本营消息》减少了。但日本帝国主义仍不甘心于失败，还利用报纸宣扬他们的势力如何强大。在1945年5月10日的《康德新闻》还刊登文章说：“最后的胜利在我日满一体与盎格鲁撒克逊一决雌雄，敌方内藏矛盾，我应努力向前。”在同一天的报纸上发表社论《由欧战结束所得之教训》，声嘶力竭地叫喊：“上下一心，坚持必胜信念，忍耐艰苦，奋斗直至最后一个人，甚而最后一人流出最后一滴血以前，绝不屈服，绝不后退。”侵略者的下场走向失败，这是历史的必

然。3个月后的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出版最后一张《康德新闻》，登出头条消息是：“大东亚战争停止，满洲帝国事业至此结束。”

《康德新闻》社社长是日本人染谷保藏。内部机构设有编辑局、局长和次长各1人。从1943年至1945年，第一个局长是日本人酒家重好，第二个局长也是日本人须藤，第三个局长是中国人于莲客。编辑局下设：社论委员会、整理部、取材部、文化部、翻译部、校对部、资料室。除校对部外，其他各部都有日本人。编辑记者共有六七十人。

《康德新闻》社的印刷厂，厂长是日本人，叫本川。副厂长是中国人，叫孟兆麟。四五十名工人都是中国人。机械设备有24吋带子式轮转印刷机2台，16页、8页平台印刷机各一台，手摇铸字机4台。还有采字、排版、打火版等设备。据当时工人回忆：铸字机铸出字以后，还需要用锉磨去飞刺，用刨床刨去字尾，然后才能使用。铅字有5号、3号、2号、初号等。排版分码小版和成大版，还有换大样子的。成完大版，经校对可以付印时，要用大刷子打好纸型，用压版机烤干纸型后，要倒成铅版，然后上轮转机印刷。每天印出的报纸，用一台三轮摩托车送到东四马路发行所发行。

日文报纸

《新京日报》

大同元年（1932年）由《北满日报》改名为《新京日报》。社址在长春中央通（斯大林大街）。日刊。发行人籍田琛磨。康德2年（1935年）与《大清蒙日报》合并，改名为《大新京日报》。

《大新京日报》

《大新京日报》是在康德2年（1935年）由《新京日报》与《大满蒙日报》合并成的。该报为私人经营。社长中尾龙夫，编辑主任片山民部。报纸每日上、下午共出12版。有轮转印刷机等一切近代设备。在沈阳、大连、吉林、哈尔滨、东京、大阪设有支社。日本昭和11年（1936年）新闻资料记载：“《大新京日报》作为推行满洲政策的前哨，发展很快。”《满洲国现状》一书记载：“《大新京日报》是满洲国言论界的最高权威。在满洲有完备的通讯网。”康德4年（1937年）10月1日与《满洲商工日报》合并。康德5年（1938年）11月10日改为《满洲新闻》，康德6年（1939年）1月1日将《间岛新闻》买下，作为附属报纸经营。

《满洲新闻》

康德5年（1938年）11月10日《大新京日报》改名为《满洲新闻》。朝夕刊8版。社长是和田日出吉，主编是笠神志都延，总务局长是名越福次，营业局长是和木本久。康德9年（1942年）总务局长是和木本久，编辑局长是森崎实，营业局长是村田攬雄。印刷设备有超高速轮转印刷机、活字铸字机、照相机。社址在长春中央道（斯大林大街）。

《新京日日新闻》

社址在长春永乐町（广州路）四段一号。个人经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成立，日本当局把《长春实业新闻》改为《新京日日新闻》。每日改出上午版、下午版，共8版。后改为晚报，12版。染谷保藏是报社代理人。康德6年（1939年）社长是上田贤象，编辑局长是松本勇，营业局长是水越内之介，总务是十河荣忠。康德8年（1941年）社长是城岛德寿，主编十河荣忠，编辑局长是片山民部，主笔是山口慎一。

印刷设备马力诺尼式轮转印刷机2台，还有莫诺太普铸造机。从业人员有日本人35名，中国人56名。

《满洲工商日报》

创刊于日本昭和8年（1933年）9月25日。晚报4版。社长得丸助太郎，编辑主任佐佐木元哉，主笔松浦郎，广告部主任金内藤太郎。昭和11年社长右谷一。印刷机械平板印刷机3台。从业人员35名。社址在长春大马路39号。

据日本昭和11年版新闻资料记载：“自昭和10年得丸助太郎就任社长以后，报纸作为纯粹的市场版活跃在新京工商业者机关报的位置上。”

《满洲日报长春号外》

创刊于日本昭和7年（1932年）3月15日。日刊。发行人男里顺生。

《满日号外》

创刊于日本昭和7年（1932年）。不定期出刊。发行人笠神志都延。

《满洲日日新闻》

创刊于日本昭和7年（1932年）。不定期出刊。发行人中村猛夫。

《大朝满洲号外》

日本昭和7年（1932年）创办。不定期出刊。发行人下村宏、坂来静一。

《大毒满洲号外》

创刊于日本昭和7年（1932年）。不定期出刊。发行人城户元亮、槽崎欢一。

《满洲日日新闻新京号外》

创刊于日本大正7年（1918年）3月15日。日刊。发行人

佐藤武雄。康德9年（1939年）发行人中村猛夫。

《新京商况日报》

创刊于日本昭和10年（1935年）。日刊。发行人田代克巳。

英文报纸

《满洲日报》

社址在长春八岛通（北京大街）。民国元年（1912年）创刊于大连，是东北唯一的由日本人经营的英文报纸。康德6年（1939年）11月迁到“新京”（长春）。社长小野敏夫，常务理事太原要，编辑局长中野升，营业局长小山市郎，朝刊8版。设备打字机7台，平板印刷机5台。

朝鲜文报纸

《满鲜日报》

社址在长春永昌路。创办于大同元年（1932年）8月24日。日刊，8版。康德6年（1939）社长兼营业局长李性在，编辑局长廉尚燮，主编山口源二，顾问崔南善。康德8年编辑局长洪阳明，康德9年编辑局长曹原理一，康德10年理事长大本正郎。设备轮转机1台。在东京、大阪、京城、北京、天津、大连、奉天、哈尔滨、牡丹江、间岛、清津、雄基、罗南等地均设有支社局。

《满蒙日报》

创刊于1932年。合伙经营。晚报4版。轮转印刷机1台。据日本昭和11年（1936年）版新闻资料记载：“《满蒙日报》以指导住在东北的一百万朝鲜族同胞为目的，于1933年创刊。组织为理事制。营业主任李性在代理理事长主持工作。该报发行网遍布东北，直到朝鲜北部。在推行满洲国政策方面具有重要使命。”

蒙文报纸

《青旗报》

日刊。社长菊竹稻穗。

通讯社

《满洲国通讯社》

《满洲国通讯社》社是由日本电报通讯社满洲分社和新闻联合社满洲分社于1932年合并后创立的。作为推行“满洲国”政策的辅助机构，该社负有极为重大的使命。机构庞大，通讯设备完善。电讯发行除在长春、沈阳、旅大、哈尔滨、丹东、齐齐哈尔、锦州等地设立总分社外，各主要城市均设有分社。经日本中转可收发世界各地信息。电讯发行遍及东北各地。东北各种报纸政治版的消息，只许采用《满洲国通讯社》社稿。而所谓“国通社”消息又都是来自日本共同社和同盟社。

“国通社”创立时，主编兼通讯部长里见甫，编辑部长大矢信彦。机构设有通信部、编辑部、庶务部、联络部、俄文部。社员约百人。康德9年（1942年）12月，十年后的“国通社”人员增加，机构庞大。理事长松方义三郎，理事寒河江坚吾、莲部昌满；监事佐藤武雄、顾问小野敏夫。机构设有总务局、编辑局、通信局、业务局、印刷所。

《新京通信》社

《新京通信》社社址在大马路49号。1934年8月由《长春满洲通信》改为《新京通信》社。出版《新京通信》日刊、日文。主要发布“满洲经济新闻”、“机关新闻”和“土建工程新闻”。社长中村明星，编辑长田森卓藏，营业部长都志牧男。

《延边晨报》始末

吴育森

龙井创刊和初步经营（1932—1934年）

1. 创刊和筹办经过。在旧中华民国17年，由延边关俊彦（建国后曾任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副主席）、方景涵（龙井电话局长）、姜渭清（延吉商会长）等发起，创办了一个地方报纸《民生报》。由于这个报曾有我地下工作人员孙×（名不详）、周东郊等编过一个时期，在唤起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启迪文化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因而很有声誉，是个在当时很受边民欢迎的报纸。也正因如此，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机关总领事馆及特务机关的嫉视，乘“九·一八”事变之机，勒令于1931年底停刊了。

紧接着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原《民生报》的编辑长张君实已公开投敌，作了龙井商埠局长（相当于今天的市长），他和日本总领事馆及特务机关之间勾搭得很密切，从张的个人意图出发很想办个报纸为自己增加些政治资本，在敌伪方面更不待言，这些侵略家伙，本来早就总结一条经验“攻心为上”，认为报纸是最有效的工具，何况当时又是所谓“新国初创”，在许多方面需要宣传“王道乐土”的形势要求下，所以也大力支持。因之就在1932年8月20日创刊了《延边晨报》，社址龙井，纸面32页，周六刊。这个报纸从它诞生一开始就赤裸裸地公开了它的真正面目，是以“宣德达情”，“日满协和”，宣传“王道

乐土”为主，是在日本总领事馆、特务机关^①、延吉市政筹备处三方联合之下举办的，是地方的机关报。这就公开地向人们宣布了它是敌伪政权的宣传工具。

2. 张君实是怎样借机起家的。汉奸张君实据说是清末大臣张××的后人，受过他的先人办洋务的一些思想影响，有一套迎合帝国主义手法，曾任驻美国领事，略通点英语，也有一点玩弄文墨功夫。本来他已落魄在天津了，正赶上东北易帜之后，各地大捕共产党，因此原在《民声报》社活动的共产党人被通缉而走了，张乃得机由天津被聘而来，担任《民生报》编辑长，那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已经图穷匕首现，中朝人民反日情绪相当高涨，特别影响到边防下层士兵。1931年秋，我驻龙井的陆军士兵，激于日警夜间挑衅，当场击毙其两名，为此吉林省政府大伤脑筋，幸亏得到地方群众反日情绪的帮忙，特别是下层士兵，仇日思想很盛，日本才没敢继续挑衅，结果赔款2万元了事。由于这件事《民声报》反映了当时士气，代表了正义呼声，起了支援政府作用，帮了政府一个大忙，论功行赏，张君实侥幸邀功，被提为龙井商埠局长（这是当时一般地方官们争逐不得的一个肥缺）。实际上张只不过巧妙地利用了人民、士兵抗日气氛，在报纸上写了几篇抨击日方挑衅，为政府争争理的文章，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反日高涨情绪，遂迫使日本鬼子仓卒由朝鲜出兵，停留不及一月又仓卒撤回。

不久伪满成立，张乃公开投敌并攀到汉奸张燕卿（曾任伪财政、外交、实业部长，据说是张之洞的儿子）门下，称兄道

^① 日本陆军罗南十九师团驻龙井的特务机关，公开挂“日本陆军驻龙井特务机关”的牌子。

弟，就这样他接管了《民生报》社的一切物资及一部分人员，创刊了《延边晨报》，把《延边晨报》抓在手里，成为自己政治上、经济上的资本。据了解伪政府每月补助报社300元，大部为张所中饱，另外张还向报社安置私人，扣押工人工资，十足表现出其剥削阶级丑恶本相，不过这个贪心的家伙竟因恋于烟（鸦片）色（好宿妓），1933年不光彩地死掉了。

当时依附于张的有张抱一，他是在张的培养下而继起担任《延边晨报》的主编角色。他在报上写了不少“社论”，大部为敌伪张目，替敌人宣传的，因此也很为敌人所赏识。还有个二号角色牛月峰，他主编地方版和文艺，是个灰色人物，在初期表现还好，后来干脆堕落得不屑一提了。

3. 《延边晨报》的主要活动内容。《延边晨报》是接续《民生报》而发刊的，由于人民对《民生报》有个较普遍的良好印象，所以虽在沦陷期间人民对于《延边晨报》也是寄予很大希望的。但实际它已变质了。它的版面共分4个版，每版8开，全幅一大张，第一版是国际版，即以社论和国际新闻为主要内容。第二版为经济版，主要为国内政治、经济消息。第三版为地方新闻，主要有日伪军事战报（主要与抗日武装力量作战的一些报道）。第四版是文艺，主要发刊一些各阶层人们所写的所谓天籁心声，毫无思想性可言，个别篇章尚隐讳地说明了一点问题。

这一时期总的主要罪恶活动，即在政治上帮了敌人一个大忙，替敌人侵略起了开道鸣锣的作用。因为那时日军刚侵略东北，人民反日情绪并未因日军强兵压境而慑服，抗日风暴风起云涌，延边一带色彩尤为浓厚。其中主要抗日力量是后起之秀的抗日联军，那时在延边最为活跃的有金日成、童长荣、柴世荣、崔贤、延吉县王隅沟，安图县的大蒲柴河，和龙县的长仁江，药水洞，汪清县大荒沟、罗子沟都是抗日的著名根据地。日

伪军警每次战斗回来都损伤很大，但在报纸宣传上，却从来不输口，称自己是“皇军”，称抗联为匪（赤匪或思想匪），每次都“凯旋”，“斩获多少”云云。这个报纸就起了炫耀日军成功，泄抗日气氛的作用。报纸的社论一方面宣传“王道乐土”，“日军替民除暴”，一方面宣传“抵抗日军无用”，“无异以卵击石”，因此日军每次出动，都附带大量报纸，以向抗日武装和人民宣传，企图感乱和瓦解军心，涣散人民抗日力量。但事实上这些报纸不落在抗联手里则已，一落在抗联手里就成为抗联了解敌伪情况的参考资料了。这个时期的该报第四版由于日伪当局的检查还有一隙可乘，不少进步文人，组织了“秋原”、“银岛”、“晓风”、“蔷薇”等专刊，刊载一些倾向进步的诗文，但多属政治上、思想上的苦闷的象征，还缺乏真实的面对面斗争，当然更谈不到什么明确的政治方向了。

迁延时期（1934—1945年）

1. 迁延背景。1933年伪满地方区域改划，成立了间岛省，省城设在延吉，因而延吉成为政治、经济中心，同时日本总领事馆撤销了。根据这种客观形势需要，《延边晨报》就由龙井迁到延吉发刊，社长由日本有关人员委派，让新由抗日救国军投降不久的周东华来担任。周也是个个人野心不小的家伙，企图以报社作为个人政治资本乘机搞这样或那样活动，以为龙井不如在延吉接触面广，也力主迁延，于是该报乃于1933年迁到延吉。

2. 周东华是个什么样“人物”。他是头道沟地主周老总的儿子，在张作霖的讲武堂学过几天，当过旧东北军的士官，1931年担任延吉县地方武装保卫团团团长，“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救国军担任团长，后来在抚松投降日军，是延吉日本宪兵队长

佐藤最赏识的红人。“七·七事变”后，佐藤调华北日本派遣军，周又投到佐藤那里，依靠佐藤的力量先后担任牟平、聊城县长，与我山东抗日人民武装为敌，做了许许多多坏事，解放后听说已被镇压。

周不仅政治上是个败类，生活亦极下流无耻，狡诈异常。在他担任社长时期，专门巴结日本人，给当时日本人警务厅长吉村送礼（上等的人参、鹿茸等），伙同日本宪兵队的邵旭东翻译蔽诈勒索，以庆祝报社迁移的名义，向当时的延吉大商号管家磨房、齐家磨房各勒索了200元，其他人100元50元不等，都为他们自己所分肥；另外还以发行地方人物志的名义向地方各阶层人大量勒索，每人最少3元，按出资多少，编写个人事迹，收的钱也都纳入个人腰包。周的另一套本领即玩弄女人，专门搞戏子、妓女，稍有逆意，即伙同他的伪军、伪警朋党寻衅生事，曾逼得当时在延吉唱得正红的金灵芝出走，还砸过演员的下处（住宅）。

周虽是武人出身，但却有几个文人朋友，为此，他由伪《大同报》（伪政府机关报在长春出刊）拉来李绩勋担任编辑长，陈大录担任政经编辑，赵鲜文担任文艺编辑，吴育森担任地方编辑，除吴以外全是新人。报纸已完全变为地道的伪宣传工具和黄色新闻了。从报面看，第一、二版全是日伪政治、经济新闻，第三版全是地方新闻，第四版全是些黄色低级杂品、短文，读了令人作呕。总之这一时期的《延边晨报》进一步替敌伪作宣传，卖力气更大了，如伪满建国4周年纪念，该报征文时，有一条当选标语是：“建国仅四载，政绩胜千秋。”以此就足以证明其平常干些什么了。

到了1937年由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统治已渐巩固，乃进一步向华北伸侵略魔手，同时加强其对东北内部的统治，厉行改

革各种机构，对新闻事业也进行严格控制，成立了所谓“满洲弘报协会”，举凡全东北的新闻出版事业单位全隶属在这个系统之下，是一个大新闻托拉斯。它兼并了其他中小新闻事业单位，在这种情况下，《延边晨报》就为满洲弘报协会接管了，周东华得了1000余伪币的油水，借机下台找到他日本靠山，随着日军进关当上了伪山东牟平县长。

这一时期《延边晨报》的主要活动，是大肆宣扬日军侵略东北、华中、华南战果；进一步麻痹人民斗志，仿佛日本已占领半个中国，中国殆无挽救希望，灌输侵略是“仗义兴师”，中国应甘受奴役的思想，说东洋有个日本可以当亚洲监主；不受白种人侵袭，联苏联共是最大罪过，主张“反共反苏”，故意为侵略者辩护，故意歪曲真理，仇视苏联，仇视中国共产党；诬蔑反侵略战争，诬蔑人民力量，宣传“支援日军、完遂圣战！”在东北全力灌输治安肃正，主张“彻底排除共匪”（主要是抗日联军）。

3. 迁延后期。1937年《延边晨报》由满洲弘报协会接管后，派来了日本人社长（由满洲国通讯社延吉支局长中村秀男兼任），改名为《间岛时报》，由《大同报》又派来了新编辑长张钰霖负责编辑事务。内部机构有所精简，只设编辑、营业、印刷三部，统受社长领导。这一时期在编辑形式，印刷技术方面，都比从前有提高，能自己铸造铅字，印铜板，也就是说它作为宣传工具，更为有利于敌操纵了。

1940年以后，由于纸张逐渐紧张，报面缩为16开周六刊，人员也有更迭，派来了日本人专职社长木谷仁，原编辑长张钰霖调回《大同报》，由吴育森接替，营业部也派来了日本人部长。木谷仁是个老牌日本特务，远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即来东北，专搞政治、经济情报，因此曾得到日皇的“御赏”，这是他

一生最引为光荣的，常常在得意的时候向大家夸耀。来延之后，和日本特务机关、宪兵队往返仍很密切，一些年轻的日本特务、警宪人员都恭维他是“先辈”。不过在这一时期他对报社内部人员一般采取笼络手段，并未授给他们什么特殊任务，他本人和特务机关关系密切的另一证明，即曾接受特务机关委托，把一个曾受日本特务机关训练过的中国特务赫贡发派到报社，假充报社记者，到县公署等机关进行采访，干着特务勾当。社内人明知他是特务，多敬而远之。

4. 这一时期的报社活动。在宣传方面已经是更进一步大谈“大东亚共荣圈”，“日满华一体化”，“共同建设反苏防共的新体制”，“皇军必胜、美鬼必败”等等谬论。内部情况报道大体是：第一版完全是战斗消息，新闻来源完全是“满洲国通讯社”（简称国通）供给。记得当时常常以头条消息报道“大本营发表”——即日本最高司令部发表的消息，实际上这种消息也透露出日军作战常常吃败仗的情况。由于在宣传上不输口，所以常称这种失败叫“玉碎”（取宁为玉碎不求瓦全之意，实际上是全军覆没完全被歼的代称）。在国内政经版第二版多宣传伪《国兵法》、出荷（搜刮粮食）、储蓄、献金、献铁，实际上是公开搜刮民财，借助于新闻宣传来动员，打掩护。第三版地方新闻，大部为当地敌伪军政警宪机关所提供，原因是那时伪省、市、县公署都成立了弘报股，它受伪国务院弘报处领导，一方面对新闻出版机关进行监督，一方面对这些机关提供一些政府所要宣传的资料，每天记者都到那里去采访。报社专有一名记者，专跑这一线路。另一记者则专跑伪日警宪机关，采访他们所提出的消息。这类消息有时以军政首脑发言姿态出现。有时以记者采访所得消息出现，此外还有些报社各地分社所提供的所谓“社会花絮”，多属桃色新闻，故意耸人听闻，迎合低级趣味，哗众取宠

之类的东西。

敌伪对报纸是怎样操纵的

1. 派其最亲信走狗或直接派日本人担任领导。伪《延边晨报》从创刊到“八·一五”解放，先后共有5个领导人，前两个是投敌的叛徒，张君实和周东华，都是日本人的亲信宠儿，后3个中村、八木、木谷等都是日本人，负责全面监督。举凡报社编辑、营业最高权限都把持在他们手里。末期连管营业的也都换上了日本人。全部职员不足10名的一个小单位，竟插进了两名日本人，其浸透工作可见一斑了。

2. 通过“检查新闻”来进行制裁。每天报纸编辑排版完了，在未印行之前必分头的向当时的省弘报股、市警务厅特务科、宪兵队三个机关先送一个样本去检查。负责检查新闻的人员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一张报纸从头到尾全部检阅一遍，如无问题，即可印行，如有问题，轻者空白，即所谓开天窗，重者补换或停止印刷，有时还要找编辑人进行追究。记得有一次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内容中有一段新闻是报道日皇检阅军队的记事，文字中恭维日皇为“大元帅陛下”，不慎被印刷工人排成“犬元帅陛下”，一字之差这是对日皇的大不敬，按出版法来讲，这是犯罪行为，幸在未印之前发现，立即订正。虽如此，编辑人员被警察列入“刑事要视察人”（即应受秘密监视），很长时期才获解除。

3. 用新闻出版法来严格限制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如违反出版法即以反满抗日名义治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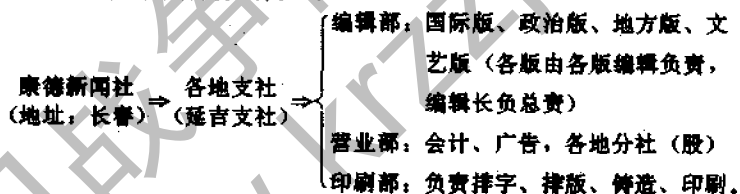
4. 通过内部密令，限制或封锁某些消息。如抗联破坏某某铁路线，攻下了某某城镇，日军在安东对教育界的大屠杀等重要事件，事前向报社发来指令，不许刊载。其中有永远不许刊

载的，也有的短时期封锁的。如伪满实行粮米统制时，在事前禁止刊载，在正式实行之后才准许登载的。

5. 通过地方机关进行材料垄断。伪省、市、县公署全有弘报股，专门替政府发言，发表消息，为报社记者提供资料，另一方面他们还代表政府，监督报社。

6. 中央监督报社的系统，是国务院的弘报处、关东军的报道部。他们是报社的太上皇，发号施令，成为敌伪新闻事业的中枢。

7. 通过本业务部门进行内部控制。伪满末期全东北汉文报纸统一归并于康德新闻社，人事、经济、编辑事务，实行高度集中到中央，各地支社均无权力。所以到了后期各报版面几乎一模一样，仅仅三、四版略有变化而已，说明敌人对新闻统制已达极点，其结构大体如下：



《延边晨报》发行量虽不太多，每天只发行500多张，但其分布区域却是全延边各主要城镇都有，其宣传面并不太小，作用是很坏的。

《延边晨报》之下还有各市、县、城镇分社（共20余处），虽属代销报纸性质，但也有写稿业务（如今天的通讯员）。他们往往借写稿，或招募广告向群众勒索；也有的借办代销为名，设赌抽头，诚为社会之瘤。

简短的结语

《延边晨报》（后来改了两次名），从1932年创刊到1945年

停刊，是与伪满共存亡。原因就在于它是敌伪的宣传工具，地方政府机关报。

日本侵略者对于侵略是有其各方面经验的，办报纸做开路先锋也是其得意之作。日寇很早就在东北办过《盛京时报》、《秦东日报》、《关东日报》一类报刊，从来对报纸是抓得很紧的。它所派进去的人也是老于斯道的，不仅掌握编辑方向，甚至经营管理，事无巨细，一插到底。

伪满新闻界点滴

金永顺

1940年8月，我考入伪满《大同报》社，在编辑局任电稿（日文）翻译，兼给文艺部绘制卡通。以后又调到吉林支社担任国际版编辑。

现将当时敌伪统治下的“新闻事业”中，我所闻所见的一些情况凭记忆拾掇如下：

《实话报》造谣是家常便饭

《实话报》是伪都中的一份黄色小报，记者经常是“闭门思访”故意编制“桃色新闻”和一些光怪陆离的无中生有的消息。惯用“姑隐其名云云”等词句，假造事实，取材偏重于低级趣味，兼而起到麻醉思想的作用。记得该报有一次因雨天无稿，一记者闭门搞了一篇《某旅馆内野鸳鸯幽会，登徒子用灯泡探入巫峡》的捏造消息，一时小报风快。这条消息不但通过检阅，还得到日人编辑局长岩某的赞扬，称之为“有出息的记者”。

一字之差，险些坐牢

1942年，伪帝溥仪出巡安东，正值我在《大同报》值班。在刊载伪帝出巡这条消息中，排字房工人将“皇帝陛下”排成“皇帝陛下”，经我校对并未发现，所幸送交检阅之前被校对主任发现才免于难。事情发生之后，大家都担着一把冷汗。因为这一字之差，就会判你个“思想犯”、“大不敬”的罪名。为这事，我们一起值班的几个人都写了“悔过书”。

端午节前发生的事

1944年的端午节前，伪吉林市公署经济科决定因循中国旧俗实施特配白糖、鸡蛋、汽水。分配量规定日本人每人鸡蛋5个、汽水1瓶、白糖1斤；朝鲜族每人鸡蛋2个、汽水1瓶、白糖0.5斤；中国人每人鸡蛋1个、每户汽水1瓶、每户白糖1斤。此事引起《吉林新报》几个同事的不满，从“日满协和”来讲简直是把日人、朝鲜族人和中国人分成老少三辈，于是大家在《龙潭晓钟》栏目中，对不平的事实加以攻击，立即引起驻扎吉林的日本宪兵队长、吉林警务处特务科长、吉林市副市长的注意，随后就发生了《吉林新报》编辑长失踪的事件。

哪里敢有真实的报道

1944年敌伪逼粮（出荷）的最紧张阶段，报社里派出一位外勤记者随同“出荷督励班”到桦甸县境。他们发现十八九岁的大姑娘，见到来人仓惶跑进圈子里去不肯出来。当时还以为山沟里的姑娘好羞怕人，嗣后听到当地人反映因为棉布奇缺，许多人穿不上衣服，有许多家是两口人穿一条裤子。类似这类消息，敌伪是不准许如实报导的，只有伪造虚构才能通过检阅，

否则就有“思想犯”、“文字狱”在等待着。

伪满洲国通讯社专门供给各报新闻通讯稿件，该社和伪首都各新闻社和报导机关有通报用的直线电话，这种电话专门由日本人把守，通报的主要作用是临时传递“重要新闻”和“注意事项”、“取缔事项”。记得有一次北满密山附近一座日军火药库被我抗日军队炸毁，“通报”传递了这条消息，随后又附注“禁止发表”（“通报”用的电话就在我的邻座，由一个叫佐野的日本人负责接听并记录，有时他记完以后离座，我就偷看几眼）。

伪满新闻业发行概况

郭 璞

东北沦陷14年，在日伪统治下，按新闻业发行变化的概况可分三个时期，由1931年至1935年假定为初期，由1936年到1940年假定为中期，由1941年至1945年东北解放止假定为末期，初期可称为全盛时期，中期末期渐趋衰落。仅就个人所知概述如下。

伪满初期新闻业发行及分布概况

哈尔滨新闻业发行概况

1. 《国际协报》（大型），发行人张复生，社址哈尔滨道里。
2. 哈尔滨《公报》（大型），发行人关宾如，社址哈尔滨道里。
3. 《滨江时报》（大型），发行人范介卿，社址哈尔滨道外。

南头道街仁义巷。

4. 《东陲商报》(大型), 发行人××(不详), 社址哈尔滨保障街。

5. 《晨光报》(大型), 发行人××(不详), 社址不详。

6. 《午报》(小型), 发行人赵郁卿, 社址哈尔滨南十六道街。

7. 《大北新报》(小型), 发行人《盛京时报》社, 社址桃花巷, 社长是日本人山本久治。

8. 《公报》(俄文版), 发行人《公报》社发行。

9. 《哈尔滨新闻》(日文版), 发行人是日人, 社址道里一面街。

10. 《哈尔滨日日新闻》(日文版), 发行人日本人, 社址道里地段街。

此外尚有薛大可(来历不明)在哈组织发行《东北日报》(记不准确), 仅昙花一现旋即废刊。王觉民在哈尔滨头道街发行《民报》, 因经费关系为时不久即停刊。

11. 外地出刊(指关内外)之报纸, 在哈尔滨设立支社或分社以营利为目的贩卖有如下多种:

国内: 有长春、奉天、天津、北京、上海等地出刊者有长春《大东报》; 奉天《东三省公报》附《小公报》、《盛京时报》; 天津《大公报》、《盖世报》; 上海之《申报》、《新闻报》; 北京之《北京晨报》; 以上都是大型报, 有的一张、二张、三张。北京《实话报》、《京报》, 为小型报, 因内容之不同皆拥有一部分读者。

国外: 绝大多数为日本东京、大阪出刊之, 如《读卖新闻》等, 读者仅为日人。

哈尔滨当地发行之各报, 内容绝大多数登载国内外要闻及

社会新闻、经济消息以及文艺作品。发行之目的除《大北新报》系日人经营带有文化侵略性质外，其余都以营利为目的，所以对人员设置（包括编辑、营业）虽系大型报亦是人数很少。如在编辑方面仅有编辑长或总编辑，编辑、外勤记者则有的一人，有的不设。因而产生了职业记者（指采访当地新闻）一稿两投甚至三投赖稿费以为生的现象，其内容则多系道听途说，闻风是雨，甚或闭户造车，故耸听闻，甚至借以欺作者，故在报面上经常发现更正启事。

长春新闻业发行概况

长春新闻业远不如哈尔滨发达，我所知仅有《大东报》一家。虽系大型，内容简陋，其他则不详，后改《大同报》并出刊小型的《实话报》。

奉天新闻业发行概况

1. 《东三省公报》附《小公报》，发行人王希哲，此系中国人在奉天经营的绝无仅有的报纸，在编辑印刷等方面远胜于哈尔滨发行的报纸，颇受读者欢迎。

2. 《盛京时报》，发行人日人，大型两大张。因出刊多年，再加日侵略者别具野心，不计赔赚，在内容、印刷上力求充实，整洁，所以发行份数较多，贩卖较广。

此外在大连尚有日人经营《汉字报》、《满洲报》、《关东报》亦系大型，较次于《盛京时报》，其贩卖地亦远达长春、哈尔滨各地。

以上系1931年前后的新闻发行概况。迨至“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成立，哈尔滨《晨光报》、《东陲商报》、《民报》先后停刊，原因不外经费不足，营业不振所致。此外所余的中国人发行的报纸虽仍照常发行，但在当地警察厅的监督下（所有稿件必须通过检阅，即使日人出刊的《大北新报》，也是

这样)，不过仅维持现状而已。时《大北新报》由小型的扩充到大张（大型）。

此外受外地影响（指奉天有画报出现）哈尔滨也先后出刊《五日画报》。发行人虽系《大北新报》，实际经营者为中国人靳辑五，在《大北新报》的援助下，自负盈亏，刊载内容与《五日画报》同。为时不久靳辑五据说因欺诈被当地人告发被日本军队逮捕死去，即行停刊。《五日画报》后几年（时间忘了）因曲狂夫改业停刊。

材料（指刊登的国内外要闻及社会新闻以及经济消息，文艺作品等）来源。当时哈尔滨发刊的各报要闻皆由日本的电通社以后是国通社供给，社会新闻则为职业记者供给，经济消息则大多数为当地的钱粮交易所发表的每日发生经济的情况，属于文艺类则为一般读者，有的给稿费，有的无酬。

经营方式。少量直接卖给读者，大都以分社性质大力招揽承办人，给予一定的利润、由分社转送到读者手里。由承办人先付出一定数量的押金（按包销份数而定），在名义上总社对分社凡事给以支持，因此，属于懒惰分子们即乘机开办某报分社，既能谋点利润，又能借此为护符从事设赌卖大烟等不法活动。分社开设地址不限，除哈尔滨、长春、奉天各大都市一种报纸可能有3~5个社外，县镇甚或一个屯也有1到3种报纸的分社。各分社所交的押金则皆为总社资金周转的流动金，换句话说，各报社即依赖此押金维持营业。

伪满初期在哈尔滨出刊的中国报纸如《国际协报》有时不甘心受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也登载有刺激性的记事。哈尔滨《公报》、《滨江时报》等则皆着重营利不计其他，因而在初期的后一段时间，《国际协报》遂在日伪当局的压力下废刊。《滨江时报》亦因经济条件所限营业不振停刊。哈尔滨《时报》则仍

然照常发行，《午报》也依然存在。

伪满政府对新闻业的统治，系由两方面入手，一方面由长春所在的伪国务院弘报机构来领导（以后改名为弘报处）。各个时期的宣传重点、内容、方法都由该弘报机构统一指示，通过长春的国通社供稿或直接向各报社发出书面指示；一方面由各报社所在地的警察厅特务科弘报股来监督检查欲刊载稿件，如有不应公开的记事虽然已经铸版亦得挖去，如已印刷亦禁止贩卖，对责任者给予申斥和写始末书（检讨书性质）的处理。这个现象多发生于国通社身上，即不应发表者国通社有时不慎发表，至于各报本身在记事中如发现错别字容易引起与日伪不利影响者，亦如此处理。另外如地方机关也专设弘报机构，省市机关有什么重要政令或什么措施会议等需要宣传，则由弘报负责人员召集各报记者发表，也有时由省市长用谈话形式对记者发表，统一刊载报上。一般性新闻亦必须由各机构中直接责任者许可，记者才可能撰稿刊登，否则对记者要给以责难，或阻绝记者以后采访的道路。

各报社的经费来源除专靠各分社的押款作周转资金外，还赖每逢新年和各纪念日、节日（指春节）招登庆贺新年广告的收入。广告专人兜揽，予以20%提成。所以每个新年这项广告费收入即有达数千元者。报社本身因为增加贺年广告版面亦增加，不另收费。

版面编排技术除《盛京时报》外多不注意。伪满末期所存在的各报在原有的基础上都有所改进，但仍无足够吸引读者的能力。

各报纸大多数社长以下分编辑、营业两部。编辑部有的设主笔（如《国际协报》），有的设总编辑或编辑长，下设编辑、记者；营业部则分营业、工厂两个部门。除属于印刷事务归工厂

外，其余如贩卖、广告以及会计等业务都归营业部门管理。

伪满中期新闻业发行及分布概况

“七·七”事变后，因日本侵略者之贪婪无厌，侵略锋芒又指向全中国，对伪满的统治日益加强，新闻业也不例外。在残酷的压力下，中国报废刊的废刊，收买的收买，按地区形成三大势力；即南满以奉天为中心的《盛京时报》；中满以长春为中心的《大同报》；北满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大北新报》。但此时的《大北新报》仍未与《盛京时报》脱离母子关系，一切经营管理仍归《盛京时报》监督，而规模则已与《盛京时报》几乎并驾齐驱，斯时出刊的报纸大致如下：

哈尔滨方面

1. 《大北新报》(大型)，出刊2大张，有一个时期出刊3大张，不久又改2大张。
2. 《午报》(小型)，斯时已为《大北新报》收买，仍然以原名义正常发行。
3. 《公报》(大型)，出刊一大张。
4. 《五日画报》。

长春方面

1. 《大同报》(大型)，两大张。
2. 《实话报》(小型)。

奉天方面

《盛京时报》(大型)，2大张。

《东三省公报》(大型)、一大张(忘了此时是否存在，估计是在这个时期中废刊的)。

大连方面

《满洲报》(大型)，两大张。《关东报》(大型)，一大张。中

国内地各报，在伪满洲国贩卖逐渐减少以至绝迹，即或有亦包裹甚密不露痕迹。日文报如《读卖新闻》等，因日本人增多贩卖份数亦大渐增加。通讯社——满洲国通讯社（简称国通）已逐渐扩充。

在此期间，日伪当局为使中文报纸在宣传方面能够满足要求，于1936年在东京召开大东亚操觚大会，被召集的有汪伪政府记者代表团、伪满洲国记者代表团。

1927年日本撤销在伪满的治外法权，在伪满国务院弘报处主持下也派随行记者团前往东京。

伪皇帝赴日本时，亦有记者团随行。在汪伪政府成立时，伪满政府亦派遣记者前往观礼。

在此时期，各省亦间有发行之小型报，如在锦州省有《锦州日报》，吉林省《吉林日报》（在初期即已发行），还有《抚顺时报》、《黑河时报》、《三江报》（三江省佳木斯）、《黑龙江民报》，至于各报确实发行年月，系官费或私营都不详细。

伪满末期新闻业发行及分布概况

日本侵略者在所谓的大东亚战争发生前，对新闻业的统治已益加强。在伪满国务院弘报处的决定下，每周在长春召开各地编辑责任者定期会议，弘报处在这个会上指示如何配合时局作好宣传工作，各报社汇报上周工作情况，这个会议多为日系人参加，至于中国人则参加以《大同报》为召集者的各项会议（进行一个时期即行停止）。

1940年7月第二届大东亚记者操觚大会，由汪伪政府主持在广州召开。被邀参加者有日本新闻界、伪满新闻界代表团。1941年秋伪国务院弘报处为便于统治和统一领导，以在长春的《大同报》为中心将奉天的《盛京时报》改称康德新闻社奉天支

社，原《大北新报》改称为康德新闻社哈尔滨支社。

奉哈两支社无理事会。哈尔滨支社编辑局在局长下设编辑、总务，地位与局次长相当。两支社本着统一领导的精神，在总社的指示和支持下，对所在的南北满各省发行的小型报进行买收归并，如奉天支社《抚顺日报》、《锦州日报》买收合并改为康德新闻社抚顺支社、康德新闻社锦州支社。哈尔滨支社则将《黑龙江民报》、《三江报》、《黑河日报》买收合并以后，又开设康德新闻社牡丹江支社、东安支社。此时一切重要记事则在伪国务院弘报处的指示下，统由康德新闻总社撰好，分别向各支社发送，限期发表。

1943年伪满举行庆祝建国10周年活动时，大东亚第三届记者大会在长春召开。参加者除伪满各报记者外，日本和汪伪政府都有记者团参加，这个会的主持者为伪国务院弘报处。

在康德新闻社出现的同时，哈尔滨出刊的《公报》于斯时亦改称为《滨江日报》。虽照常出刊（大型），但亦是气息奄奄，勉强出刊而已。斯时，哈尔滨新闻业只有康德新闻社哈尔滨支社和《滨江日报》两家，长春则只康德新闻社一家，奉天则只是康德新闻社奉天支社一家，而体系亦一元化。至于大连亦只有《满洲报》一家，较诸伪满初期使人有不胜今昔之感。这个局面直至1945年东北解放。

日军侵占后的佳木斯电报局

陶冶馨口述 刘天光整理

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虽然东北地区成立了伪满

洲国，但行政机构，基本是原班人马，换汤没换药，所不同的是把国旗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换成了“红蓝白黑满地黄”而已。延至1934年，才有日本人正式接收电报局。时间是在冬季的某一天晚上，突然开来了很多辆轿车，有官、有兵还有翻译，其中也有不少文职官员。第二天主要机关、部门都派来了日本人。

来佳木斯电报局进行接收的第一个日本人名叫高木卫。他是日本海军的退伍通信军官，通晓英文，并能拍发英文电报。到任后的职务为“主事”，这是日本企业的官衔。他的权力大得很，局内的一切大权，都由他掌管，就是局长要决定事情，也必须得到他的同意才能执行。

接收伊始，在机器设备上没有什么增添，业务上增加了一名会拍发日文电报的报务员，面对一些年龄稍大的老报务员，一律均以“待命”为由，发给6个月工资，令其等回家，不再录用。以后开始办理日文电报业务（在1934年日军未接管佳木斯电报局以前，佳木斯电报只发中文电报、英文电报，不办理日文电报，老电报员也不懂抄发日文电报技术）。由于当时的中国人只会拍发英文电报，要发日文电报；还得把日文的“カ、キ、ク、ケ、コ”，拼成英文的“Ka、ki、Ku、Ke、Ko”才能发出。因此，在电报业务上设了二个班子受理业务，凡是日文电报，都由日本人值机、拍抄；中文电报则由中国报务员利用莫尔斯电报机抄发。

1934年，也就是日本人接收后的同年6月。日本人运来了新机器，全部废除了莫尔斯电报机，从此，全部改为音响通报了（音响通信就是听音抄、收电报）。以此为契机，日文的电报量，一天比一天增加起来。

1936年，为了改造接收过来的英文电报员，使他们学会拍

发日文电报，在哈尔滨市马家沟开办了电信讲习所。由局抽调一名有发报基础的青年电报员，送去培训。这一年的2月，我作为第一期的学员，在这个讲习所学习3个月，主要科目是学习日文音响通信。我就是通过这次学习，又掌握了日文的抄发报技术，回局后可以用英文、日文双管齐下值机上台。

1937年，随着电报业务量不断增多，将原来归地方上商务会经营的市内电话局，接收过来并入电报局。当时市内电话局，已有百门磁石式交换机一台。全局工作人员，大约10个人。改名为佳木斯电报电话局。至于哪一年又把电报电话局改为“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因为年久我已记不清了。

合并改名后的佳木斯电报电话局，把电报部分的设备、人员和业务，从西门里的老电报局，搬迁到通江街后院的市内电话局，一起办公。西门里的旧址，改为无线电发射台，设有150千瓦功率的无线电发报设备和蓄电池及充电设备。

电报通信分有线与无线两种，以有线为主，主要干线有佳——哈，佳——富，佳——鹤三条主要线路。为了防止干扰，收发报机分驻在西门里电报局原址和通江街路东“东乐天饭店”后院新址，每天与哈、富、鹤等地进行联络。在有有线线路和路杆发生故障时，则利用无线电疏通电报。

随着市内电话之接收，把原电报和电话局的员工20多人，和新增加的一些日本人，集中起来大力进行技术更新和改造。并按日本人的管理方式，分别设立了电报、电话、技术、线路、庶务（现在的总务那一摊）等课（相当于现在的科），各课都有一名日本人当主事（相当于现在的科长），下边又设若干系（相当于现在的股）。从而，使一个仅有8个人的老电报局，一跃成为拥有40左右人，比较大的通信机构。

电报费用：伪满洲国成立后，自己发行了纸币，起名叫

“国币”，当时的兑换率是1元钱纸币换1元现大洋。那时在街面上已经禁止使用现大洋，可是老百姓背地里仍用现大洋作为货币流通标准，兑换率高于“国币”。因此，拍发电报时，都用国币现金支付。打“和文”（即日文）电报，每组6分钱，地名和人名以两组标准计算，所以打“和文”电报，每份电报有六七角钱就足够用了。因计价便宜，凡是能掌握日文的商场、货栈、工厂等大买卖，以及个人都愿发“和文”电报。中文电报是按字计算，每个字虽也是6分钱，但是地名、人名、内容也算电文，每份平均约在2元左右，所以发中文电报的日渐减少。以比例衡量，日文电报的比重要占80%以上，中文电报不超过20%，英文电报逐步淘汰。

电话业务有了很大改革进步，挂长途电话，可以不必再到电报电话局窗口挂号，有市内电话的，坐在家里就可以挂，而且可以直通哈尔滨，除遇风雨雪雹天气外，基本听得清楚。计费标准，以每3分钟为一次通话，超过3分钟而不足第二个3分钟算两次。以此类推，按通话地点远近不同，各有各的价。电话的月租费，每部电话每月收代料（就是电话费）5元。

伪满洲国大同年间（指1933年以前），虽然日军侵占东北，佳木斯涌进了不少日本官吏和经商的日本人，但毕竟比康德年间（从溥仪登基做了伪皇上算起）涌进的官吏、商人、军队、开拓团少得多，所以康德年后发报量猛增了，每天抄发电报300份左右。

就是这300份电报量，用机器抄收，也很不适应，因而每天都存在压发电信现象。为了适应业务量改动的需要，经日本技师动手，把人工音响电路，改为“双工”通信，就是4个人为一组，在同一条电路上，同时收发，可以做到互不干扰。尔后又改成“快机”工艺技术，就是发报纸条，先用“三柱作孔”打

上眼，尔后用快机发出。这种快机的性能，每分钟可以发出电文280个字。

日军侵占东北的目的，就是要把东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佳木斯一带有丰富的煤炭、木材、毛皮等工业原料和大豆、小麦等粮食。为了把掠夺的重要物资，集中和运输出去。一方面修建了佳—哈铁路和两处飞机场，把佳木斯建成水、陆、空联合运输的交通枢纽。另一方面在这里屯驻重兵，以期配合法西斯德国从东方进攻苏联。为此，日本侵略者不仅把佳木斯这个小镇，升格为市，而且还变成了伪三江省的省公署所在地。

自从省公署设在佳木斯以后，市政建设得到了发展。大批日本移民不断迁居到佳木斯附近一些县份。统治中国人民的一切机构，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交通，甚至管煎饼铺的、修鞋的组织，都派进了日本浪人当头头。同时垄断中国经济命脉的一些企业，也相应地陆续地建立起来，诸如什么主管煤的“满炭”，主管掠夺土地的“满拓”，以及名目繁多的“满电”、“满林”、“满毛”等。满洲电电就是其中的一个。

日本侵略者在这里不仅建成了银座街、同和街和顺和街的日本居民区，而且他们还有自己的专用商店。如消费组合是专为官吏服务的；为军队提供副食的商店叫作“陆军御用达”；甚至连日本兵的军用妓馆都有相应配备。佳木斯的电信行业受这种畸形发展环境的影响又有了新的进展，成为日本侵略者进行侵略、掠夺、开拓、殖民、工商活动的重要的通讯工具。

1938年，电报电话局由合并后的通江街原东乐天饭店后院，迁到南岗大街新建的三层大楼（即现在的地址），正式挂出“满洲国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的牌子。全局职工约在200人左右，其中80%是日本人，所有各部门管事的主事，都是日本人。在

这个局里，中国人当“干部”使用的只有5个人，其中3个人是报务员，一个是庶务员，一个是机务员，其余的都是话务员、投递员、线路工或杂工。

这时的电报局，由于配备了150千瓦和300千瓦发电机各一部，已具备自动通报条件。所以佳木斯电报局成了中心站电报局，佳木斯附近各县发往哈尔滨以南的电报，都由佳木斯接转哈尔滨电报局，由哈尔滨电报局再接转其他地方。电信地点，不仅在东北三省可以做到四通八达，连朝鲜和日本本土都可以和佳木斯联接电报。

市内电话，在磁石改供电的基础上，全部改成了自动电话。有百门交换台4台，自动交换台1台。在当时情况下，基本满足了市内、长途电话的需要。

1942年，针对扩大电报电话业务的需要，又分别在南大街（现在德祥街工人浴池原址）和同合街设立两个支局。服务对象，南大街支局专为中国人服务，同合街支局供日本人和归顺日本的朝鲜人使用。这二个支局都把接受的电文，发往市局，由市局统一编号外发。

扩大后的佳木斯电报行业，业务量明显增多。在一般情况下，每个班都要抄发四五百份电报，平均每分钟抄发一份电报。可是值机的人手不足，常常造成电报积压。当时能上台的受过正式电报训练可以值机抄发报的有韩锡候、刘家崎和我，再就是日本人。日本人中有的技术老手，多数摆资格、嫌累，少抄、少发也没人敢管。而那些从开拓团新抽上来的新手，还属于培养提高阶段，3个人不顶一个人用。于是重担就压在我们3个中国人身上了。

在我们3个人值班的时候，都能保质保量轻松地完成任务，可是一到日本人值班，到交接班时，总有留发电报50到100份，

这就无形中加重了中国电报员的负担。报务人员既是脑力劳动，又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既要求速度快，每秒钟抄发一个字，又要求绝对准确无误。

当时，报务员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还被看做有技术的体面人，可是在日本人手下，无疑就是奴隶。少干就要受斥责，怠工就要被开除没饭吃。特别是还有日本宪兵，日夜在电报局监视、守护，弄不好就很容易当做反满抗日，拷打处死。报务员韩锡候得了重病，日本人硬是不准假，让他出勤，韩咬牙坚持了两天，就病倒不能上班，到第六天头就活活被折磨死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日本侵略者虐待中国报务人员的罪行，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叫人切齿痛恨。

报务员刘家崎，虽然没遭到和韩锡候那样可悲的下场，但也挨了日本浪人一顿猛揍。事情的经过是：有一个经营“三姓楼”妓馆的日本浪人，这个日本人是“中国通”，在日本宪兵队当翻译，又是妓馆的老饭，还很可能兼电报局什么官。这个“三姓楼”，有如日本影片中的“望乡”性质，挣来的钱主要资助日本军修飞机场。有一次发来一封军用飞机即将在佳着陆的电报，由于刘家崎过度疲劳，在值夜班时睡着了而误了事。结果被那个浪人和日本宪兵，打得鼻青脸肿，辨不出面目了。

论遭遇我是其中最幸运的一个。我在1938年由于连续发报，手累肿了，而且还得了肺浸润。经过当时的佳木斯最大最有名的“满铁”、“满赤”（满洲国赤十字会）两家医院会诊，都开出了肺浸润的诊断书，本来应当休息。恰好饶河电报局因缺乏熟练电报员而发不出报，硬把我逼到饶河电报局去，作为特殊“恩赐”和“照顾”，叫我边工作，边休息。

作为电报员，我也享受过难得的清闲，这主要是归功于抗日联军破坏线路的革命行动。在1936年到1937年这两年，我党

领导下的抗联战士，活动十分频繁，而且对敌斗争很有成就。隔三差五，不是将哈长线切断，就是其他线路被割，由于维修费时费力，再加红地盘抗联的抵抗活动，所以一旦线路遭到破坏，少则三两天多则五六天没事干。有时边修边遭到破坏造成连续多日不能通电。这时我们中国的同事都窃窃议论，拥护“抗联”这种抵抗活动，它为我们带来了希望。

我50年来一直干电报这一行，这种工作必须聚精会神，手指必须不断地、准确无误地敲打着键盘，结果我的右手先是经常青肿，继则颤抖，最后终于痉挛萎缩而失去运动功能。在解放以后，我做了一段时间的报务工作，党和国家为了照顾我的身体，叫我去做电报的教学工作，使我有机会继续为电报事业发挥余热，为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做点贡献。

（摘自《佳木斯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伪满“满洲电信 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始末记

王家栋

“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电政事业的概况

东北电讯和邮政原来均归交通部管辖，部内有电政，邮政两司分别掌管。但东北情况特殊，南有日本南满铁路和所谓“关东州”（旅大地区）经营的电气通讯事业，北有中东铁路（苏联经营）的通信设施，在电政事业上，主权受到严重侵害。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由于通信事业是政治、军事的神经中枢，就首先遭到日军的侵占，通令立即与南满铁路沿线日本电信、电话局合并。许多员工受到迫害向内地流亡。在

沈阳，首先由“维持会”决定成立了东北电政管理处，设在沈阳故宫内。在日本军管下，由沈阳满铁附属地日本郵便局局长岐部与平和吉林省城电报局局长白锡泽为正副处长。随即着手恢复已占领的各城市原有的国营电报、电话局及无线电台的业务。1932年3月1日伪满傀儡政府成立，伪交通部接收了各地电报、电话局。并将沈阳的东北电政管理处划分为奉天、哈尔滨两个管理局，分别管理东北三省以及蒙疆热河等处的原有的电气通信事业。

当时由于南满、中东两路另成系统，在经营管理上有很大矛盾，因而伪满通信事业必须“一元化”的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这时，我是长春市电报电话局局长，有关当时情况回忆录述。

“满洲电信电话股份有限公司”的创立

日本帝国主义者要加速侵略，自然要控制满蒙通信事业，出于它们经常所讲的“一元化”（例如铁路一元化）的需要，于1933年9月1日创立了“满洲电信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名义上是日“满”合办，实际上就是交给日本人包办。通过所谓两国政府协定，把原东北所有电气通信事业和南满铁路沿线附属地以及“关东州”内日军所霸占的大众通信机构全部合并，统归“满洲电信电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电公司）经营管理。从1933年9月1日起正式开始接收营业，从此东北四省所有的有线、无线电气通信设施，全部被日本侵略势力掠夺到手。日本帝国主义者对该公司极为重视，因为它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均负有重大使命，在贯彻执行侵略政策上，是一时一刻不能离开的，所以日本人对电电公司称之为“国策公司”。

日“满”两方协定内容有：

甲、权利

1. 公司之财产所得、营业契约、登录以及其他事业上必要之物件，得以免除租税及一切杂捐。

2. 享有关于电气通信设施上所需要土地之收买权、业务必要时交通机关之利用及其营业上所必要之一切特权。

3. 对铁道及航空事业附属的通信设施以及警备专用的电气通信设施，如需利用时，须向监督官所申请许可。

4. 公司发生意外解散时，政府当以相当的代价收买。

乙、义务

1. 公司制度的变更，董事及监事选任及解任、公司债务的募集、电报电话费的决定及变更、利益金的处理、每年度事业计划、各种协定的签订、设备物件的让渡等等，均需得到两国政府监督官所的许可。

2. 对两国的军事通信，应采取军事上必要的措施，必须认真执行。

3. 公司对两国政府铁道、航空、警备厅必要的通信，须无条件的供应。

4. 在两国政府免费处理范围内之电信业务，今后仍继续有效，及予免费处理。

5. 两国政府对公司的设备业务，以及财产状况、工事施行状况的报告，依据命令提交两国政府监督官所检察。

6. 公司在接收两国政府出资电气通信设施的同时，根据电气通信设施及业务，以及各种设施需要的工作人员，一并接收。

丙、其他

1. 股东及董事限日满两国政府的公职人员或私人。

2. 民间股份股息按年分配利润，政府股份不发给利息。

3. 每年利益金的分配不得超过一分。

4. 对“满洲国”政府公民或法人分得股票，在每次交纳股款或支付利息时，均以“满洲国”通货为基准。

5. 不得以公司的电气通信设施，或附属的设备物件等作为担保品，或作价处分等。

所谓东北电气通信事业的“一元化”

公司的实质是替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东北所有的电气通信事业全部掠夺过来，交由日本人统治。因此在公司成立的当时，立即把原国营的通信事业，全部接管。接着就陆续进行接管东北的县营、民营或县民合办的四乡电话事业。但这些地方办的电话局，规模大小不一，在经营管理上多半各自为政，杂乱无章，既无系统的管理规章制度，也无系统的技术操作规程。当时东北各地方计有电话117局，电话用户14 000余户，散在全东北四乡各处。在伪“电电公司”成立后除警察及公署机关事务专用的电话外，其余通信设施全部被该公司接收。根据两国协定，该公司按年分别提出一部分资金，作为收买县营、民营等电话局的收买费，以实现日本侵略者通信事业“一元化”。

1935年3月，日“满”向苏联强行收买中东铁路，铁路沿线的通信设施，伪满交通部即交由“电电公司”接管。

当年延吉地区（现在的吉林省延边自治州）各县没有经过条约形式，由日本帝国主义的朝鲜总督府强行在我国领土上，通过当地的日本领事馆设立的电报电话局也被“电电公司”于1936年3月间，从朝鲜总督府会宁邮便局接收过来。

该公司在通信事业接管中，无论是原国营的或是旧军阀经营的以及资本家经营的均被一网收尽，然后按日人计划，加以归并调整，并建立各种企业的规章制度。合并了满铁、东铁以及所谓“关东州”与延吉地区的通信事业，至此日本侵略者一

贯所追求的通信事业“一元化”，完全实现。日本“电电公司”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是从日本国内递信省邮电部派来的，也有些从原南满铁路沿线附属地，以及“关东州”电报局电话局接收过来的日籍工作人员。所有各局通信业务，全由日本工作人员包办，把持一切，留用的中国人全是些电报员、电话技术人员和线路工、送电报工、杂役等。担任高级较重要职务的中国人是绝无仅有的。

“电电公司”机构的组织形式

伪“满洲电电公司”接管了伪满境内中、日、苏三国的电报电话，无线电各种通信设施。它的监督官所为伪满交通部 and 日本递信省，在撤销了奉天、哈尔滨两电政管理局的同时，另在奉天、哈尔滨两邮政管理局内，增设电政处，专门从事监督管理伪满电气通信业务。

1937年伪满交通部邮务司改组为邮政总局，在总局内设电政处。各邮政管理局内的电政处又改为电政科，专门从事监督管区内的电气通信业务。除上述各监督机关外，伪满政府为强化国家“弘报机构”，特别对广播事项及广播通信的指导、取缔，规定由“国务院弘报处”直接监督，交通部仅负责监督一般的公众无线递信业务。至于对广播电台的主要广播方针与广播内容，统由“国务院弘报处”负责掌管。它是以伪国务院总理大臣的名义实行监督的，而交通部仅是对广播的波长、频率、设施等方面进行管理。至于日本递信省对“满洲电电公司”的关系，由于伪满交通部的工作人员几乎全是由日本递信省派来的，等于直接经营一样。此外，“电电公司”的重要工作，又全部是通过日本关东军的计划制定的，这就说明关东军有操纵指挥实权。

伪满“国务院弘报处”是一个推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反苏、反共、奴化中国人民思想，实行法西斯统治的一个“特务机关”。关于伪满的一切奴化教育和法西斯宣传，都是由“弘报处”一手包办的。凡属宣传机构，如广播电台、报纸、文艺团体、杂志社、电影制片厂等等，均由“弘报处”直接监督指挥，根据“弘报处”所制订的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全国广播电台所宣传的各种侵略政策，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全须听从“弘报处”的指示。

“弘报处”从表面上来看，是伪满国务总理大臣直接掌管的一个政府宣传部门，但从实际工作性质来看，它是在日本关东军直接支配下，做实行所谓大陆政策灭亡满蒙的侵略工具。

“电电公司”的组织机构是：在公司总裁的领导下，设4个部，1个无线总局，6个管理局，1个地方局，2个职员养成所。在各局下设若干课系，掌握电报、电话、无线电台一切业务。总裁及各部部长、总局长职务，由理事（董事）分别担任。公司内除副总裁及无线电总局局长及一名监事是中国人外，总裁及各部部长全由日人充任。公司内高级职员有参事及课长两员、秘书一员，共3名参事定员，其余为一般职员，在文书课内有翻译3名，规划课内有计划科员2名，共有10余人在本公司工作。其余在各局方面工作的都是低级职员。公司内副总裁以下总局长、监事、参事课长、课员、翻译等10余名中国人，全是有职无权、吃饭拿钱、牌位而已。我当时在公司的经理部充当营缮课长，当然也不例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什么也不知道，这种亡国奴的滋味，实非局外人所能意及。

公司的总裁、副总裁、理事、监事等高级干部，要通过股东会推选。按协定规定，每年3月末公司召开一次股东大会，会上通过例年决算，及当年预算、当年业务规划等报告，并通过

董事、监事等高级干部的推选，任命总裁、副总裁、各部部长、总局长。公司各部部长、管理局和地方局局长等均由参事技师等级的职员担任。以下一般职员分三级，即甲种职员、乙种职员、准职员，除此以外则为雇员（技术工、杂务工、送电报工、收费员等）。

工资待遇是上厚下薄，相差悬殊，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特点。上层工作人员收入多，养尊处优，而一般工作人员和工人们是被剥削和压迫的对象，劳累终年吃不饱穿不暖，尤其是中国工人的工资还赶不上日本工人的一半，也没福利劳保待遇。当时工人们常说“黑爪子挣钱，白爪子花”，这充分表现出来工人群众对日人的愤恨不平心理。

(1) 总裁、各部部长、监事、总局长等待遇极厚，他们的年俸总裁是1万元，部长、总局长7000元，监事6000元，另外每年可分红利1万元以上，总裁每年总收入达3万元。

(2) 职员们的月俸，根据学历、经验及担当的职务，分别制定工资额。职员最高月俸为450元，最低为30元，另外每年按工作成绩、出勤状况，分别按两期发给慰劳金。一般雇员，每人每年应分得的慰劳金逐级缩减，为数极少。

(3) 雇员是日工资制，按工作日数计算，出勤工作就给钱，不工作就没有工资，当时日人管这叫作“日给者”。这些低级的雇员们，每人每天拿的工资不过5~6角钱，最高也不过1元5角钱。

依上述情况，可见总裁1人的收入，相当于中等职员20人的收入，相当于下等职员30人的收入。真是上厚下薄，相差悬殊，伪满社会对工人阶级的压榨摧残就是这样。

关于福利劳保待遇，中日两国职员虽在一块劳动，系同样等级，则差别很大。日本人不分职员或工人，全都在公司建筑

的文化宅居住。对中国人员除副总裁、董事、监事、参事级的高级干部有文化住宅外，其余一般职员和工人，仅发给微许的住宅费，由自己找房住。因此一般中国员工，没有文化住宅，都是冬不能防寒、夏不能防热的草舍茅屋，卫生条件极差。发生疾病时，需自己花钱去治疗，没有免费医疗的待遇。死了没人管，要是因公伤死亡，也不过给400~500元的丧葬费，谈不到什么抚恤劳保，劳动人民的处境，真是牛马不如也。

如前所述中国人在公司内任高级职员的，已为数无几，至于各外局，如各大城市一、二等的电报电话局，全是日人当局长，各大局的工作人员中国人也为数极少，仅电报员、送电工，用中国人为他们效劳。至于在各小县城镇的三四等小局局长，才派中国人去充当，多半是些老电报员出身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者还要派二三名日本工人来监视。中国局长事事都得取得日本工人同意，才能执行，才能维持住他的饭碗。

业务概况

1. 电信：随着伪满局势暂时的稳定，电报利用者在逐年增加，在旧中国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对无线电报相当重视，沈阳设有功率强大的无线电台，除处理全国各地的无线电报外，同时办理国际方面的无线电报通讯。1934年伪满在长春的大无线电台建成后，即把沈阳的无线电台国际通信业务全部移交长春无线电台办理。沈阳、哈尔滨、大连三个无线电台，专办理对日本国内和中国各地的通信业务。到1939年末止，东北境内已有了48个无线电报局，能和有线电信网相呼应办理通信业务。

又在1937年9月份起，同日本各地开始实行电视通信（电信传真）业务，加强了日伪间的通信联络。

2. 电话：伪“电电公司”历年架设新的电话号数远远赶不

上实际需要，因此各大城市的电话号，就现出一种供不应求的现象，投机分子从中抬高电话的市价，把用200~300元装设一台的电话，经由日本买卖商人一转手就卖到2000~3000元的高价。因此一般私人经营的小工商业者，几乎无法装设电话。

无线电话在长春无线电台建成后，装成日满间无线电话回路，从此日满两方各主要都市，全部能随时随地联络通话，缩短了日满间之距离。

3. 无线电台：东北无线电台事业，约在1923年各大城市即开始建设。因为它是新的技术科学，懂得的人还不多，彼时地方电力供应不普遍，人民文化程度又比较低，因此未能迅速开展起来，只是沈阳、哈尔滨、大连等几个大城市有，主要是收受、拍发官报，一般商报比较少，利用极不普遍。至于无线电话的使用更是寥寥无几。在广播方面，也是同样。当时，唯有军阀、官僚、富商、大户一些资产阶级用它收听音乐、戏曲和新闻报告等，作为酒后茶余的消遣。投机商人利用它收听经济行情、做倒把的勾当，一般劳动人民有的甚至买不起一台收音机，是得不到广播欣赏的。

伪“电报公司”成立后，除接收了沈阳、哈尔滨、大连等三处无线电台外，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深入，在长春又修建了一所大型无线电台，大肆扩充无线电广播事业。在长春、奉天、哈尔滨、大连等四个大城市，除办理通信（电报电话）业务外，都装设了无线电广播台电话回路。当时在这些大城市收听广播的仅5800余户，日本侵略者为加强推行满蒙侵略政策，又在东北各地大量增设无线广播电台，遍地设立无线电普及营业所，向广大人民群众动员收听广播，推销无线电收音机，不但廉价出售，而且还可赊卖，分月付款，由普及营业所办理赊卖手续。每月按户收广播听取费5角，作为广播收入，

按月由普及营业所收费员去收费。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利用这个广播宣传机构，始而向伪满国内宣传“王道乐土”、“一德一心”等奴化思想，继而反苏、反共、反人民，并向华北、华东方面大力宣传侵略整个亚洲的政策，即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煽动喉使搞独立自主，以分裂中国。由1933年到1941年止，不到10年内，在东北四省就设立了15个无线电广播电台，有中、日、俄、蒙、英等5种语言，日日夜夜地向各地传播各种侵略政策。到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全东北各地听户已达45万余户。当时还在各主要城市，增设“二重广播”，即用两国语言同时广播。在奉天、大连、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处用中、日语，在海拉尔除中日语外，还用蒙俄两种语言，同时哈尔滨还有俄语的广播。日伪的广播事业，主要目的是在于宣传其侵略政策和进行奴化教育，但就每月向听户收取取费讲，已充分说明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的经济掠夺，如水银泻地，是无孔不入的。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便于向东北各地普遍推行其侵略政策，对各广播电台的设置是煞费苦心的，伪满各地的广播台犹如星罗棋布。

在上述这些有线无线电信电话的联络网外，日本侵略者为确保伪满境内通信安全和加强日满间通信联络，扩大远距离通信网，从1935年起开始建设远距离地下“无装荷电缆线”。首先是从安东到沈阳，接着从沈阳到长春，全部工程，于1940年完成，这就解决了日满两方首都间，以前不能直接通话的困难，而更便于伪满对日本、朝鲜间的长途联络。这种新技术的地下“无装荷电缆线”的建设完成，在日本科学技术界，划一新纪元，电气通信技术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从此以后5000公里以上远距离的通话，得以畅通无阻，而且增加回线的回路，即是一回线可作三回路使用，提高了使用效率。

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华北华东后，野心更进一步膨胀，发动太平洋战争，侵略东南亚，称霸整个亚洲。在这种情况下，伪满就向中、苏、欧、美各国和南洋方面开辟了国际通信直通回路，扩大了通信范围。另外，日侵略者又把英国和丹麦两国经营的大东、大北两个电报公司在远东敷设的海底电缆掠夺过去，以达到通信事业的垄断的目的。

职员养成所和职员练成所

为了大量培养电气通信事业各种必需的技术及业务知识后备人才，“电电公司”在长春、大连两地各设职员养成所一处。招收中日两方的中、小学毕业生入所学习。2年毕业，毕业后分配到各电信电话局、所服务，到1941年末计有2000余名毕业生已在工作岗位上服务。但都是些地位低微的电报员、话务员，每月收入不过20余元。这些工作人员中的中国青年，多半奴化思想很深，只知做驯服工具而已。至于职员练成所，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青壮年几乎全部应征，所有在乡军人以及老弱也都召集出来，投入侵略战争当炮灰，人力痛感不足。于无可奈何中，只得用中国人和外行的日本人代替来担任后方各单位工作。“电电公司”也不例外，因而就在职员养成所内，设立一所职员练成所，专门培养在职干部和新补入的外行进行短期的业务技术训练，同时对思想上及体格上也进行训练。这个练成所因系在战争后期为了适应战时体制而设立的，从开始设立之日起，到日人投降之日止，参加学习的人数不多，没起到多大的作用。

以上仅就我个人在伪“电电公司”工作经历的回忆作以记述，可能有些不妥不详之处。

伪满电信电话公社的设立

阮拯铎

1933年我在伪建设局时期，曾兼满洲电信电话公社设立委员会委员。当时伪政权的各部总长、次长、局长等，和长春市各大商号老板，以及地方银行经理等，都是委员。委员长是日本退役海军中将山内静夫，副委员长是三多。这个公社是满日官商合资，伪满是以原东北各地电报局、电话局等各种设施作为现物出资，并加入了一部分股份。委员会目的就是为了募股，因之各委员不拘多少都得认股。每股100元，分四期交纳，我认了20股。这个公社于同年成立，把伪交通部所管的电报、电话和放送等事业，全部交给该公社经营管理。这个公社因有日本方面出资，是属于特殊公社的一种。从此就切断了东北人民对内对外的消息，任凭日本侵略者捏造欺骗宣传。